

追三代於鼎彝之間

——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

陳芳妹
國立臺灣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古銅器，歷經商到戰國，在漢帝國後，基本上已歸於沉寂。宋代，唯古銅器不只無意間出現，且被有意的尋訪、珍藏、研究、紀錄成書；或被用以銅質仿造其形制、紋飾、或銘文；或更進而以當代時尚的質材如陶瓷、金、銀、玉等仿造，使「三代銅器意象」間雜在時潮中再生。宋人把三代銅器從三代貴族所坐擁的家國重器及主要用在祖先崇拜中，放到儒釋道及民間信仰的新情境中再生，隨之質變，而與三代漸行漸遠。並進一步走入宋代庶民的現世生活中，從廟堂到陳列在明窗淨几之中，成為宋人坐擁三代的符號，也成為不同階層中其不同的「考古」及「玩古」的新價值觀的具體意象。

本文試圖以新近考古材料，特別是未經解讀或已被解讀但卻被忽視的面向，包括出土情境、器群關係、銘文及墓主身份等，以結合文獻紀錄，簡選代表器群，試圖重建人與物的可能關係，包括如人與其社會、政治身份地位、與物的使用脈絡間的互動等，以探索「三代銅器意象」在宋代的再生及其背後動力。包括古銅器從被「散棄」到「考古」到「玩古」的觀念改變、觀念所來自的贊助階層的社會、經濟、政治與宗教基礎的擴大與變遷，促使再生現象一步步的深入儒佛道、甚至民間信仰世界，並進入庶民的休閒生活中，基本上奠定了元明清持續一千多年的主要發展基礎，以說明此現象對器物藝術史的影響。

關鍵詞：三代、考古、玩古、香爐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NSC92-2411-H-002-063）之執行成果。

一、序

與上古相比，宋代銅器的研究顯得較冷清。客觀上，銅從上古成為藝術的主流質材，到宋以後，已淪為非主流。不只作為斷代標準的材料相對不足，學界研究成果也相對薄弱，這是傳統藝術史研究重視藝術原創性的觀念的結果。唯近年來，研究成果及研究條件已改善，而仿品事實上反映了當代人的生活品味與思想型態等，以及新近考古材料的陸續出土，已為此範圍的研究開啓了新天地。

事實上，清末至民國以來，宋代的大量文獻著錄，尤其有關的金文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為學界所關注。¹ 而古物研究者、古物收藏家、古物仿造、偽造及古物市場取象等課題早已被論及，包括「著錄」、「收藏」、「仿造」、「辨偽」及「價值」等² 方面。但相對於上古考古的研究在近六、七十年來的蓬勃發展，上述議題往往淪為沾有古董市場及古董商業息氣的範疇，而罕見學界關注。民國71年（1982）臺灣有學者根據宋文獻有關三代銅器與古代石刻作了較為全面性與學術性的探討宋金石學，³ 但有關銅器視覺形象方面的議題仍較少著墨。

相對的，由於歐美博物館等庫房收入不少上古以後的青銅器仿品，學者開始以學術的態度將宋以後仿品放在當代歷史脈絡中討論。⁴ 更有從仿古主義（archaism）的角度，將宋代仿古銅器與上古銅器作風格比對，以討論仿古過程中，形制與紋飾所師法的角度，指出《考古圖》及《宣和博古圖》圖錄皆成為宋以後仿古的範本⁵ 的現象。此外，文人品味被放入宋以後的青銅器的研究領域中。⁶

事實上，英國倫敦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收藏中國銅器主要不在商周，

-
- 1 唯止於目錄，學術議題或稍涉及，也語多精簡。王國維，〈宋代金文著錄表〉、《觀堂集林》上，頁295-298。
 - 2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社，1941），燕京學報專號，第十一、十二、十四、十五章。
 - 3 葉國良，《宋代金石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文學研究所，1982），頁4。
 - 4 Robert Poor, "Notes on the Sung Dynasty Archaeological Catalogues,"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19, 1965, pp. 33-44; Peter Hardie, "Six Later Chinese Bronze at Bristol," *Appollo*, vol.XCII, 107,1971,pp. 58-59.
 - 5 William Watson, "On Some Categories of Archaism in Chinese Bronze," *Arts Orientals*, 1973,pp.1-13. 張臨生也把故宮宋以後的帶銘的〔文王方鼎〕及〔仲駒方簋〕放在此脈絡中加以理解，張臨生，〈〔文王方鼎〕與〔仲駒方簋〕〉，《故宮學術季刊》，15卷1期（1997年秋季）。
 - 6 Ulrich Hausmann, "In Search of Later Bronzes," In *Scholars Taste* (Sydney: Sydney L. Moss, Ltd., 1983). 宋以後青銅器也引發骨董市場的關注（Michael Eveleigh, "Later Chinese Bronzes," in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Asian Antiques Fair* (Hong Kong, 1984.)。

而是以宋以後為大宗，因此，成為其研究人員的重要研究課題。其根據銘文或考古資料，試圖建立宋、元、明、清等朝代段落的基石⁷與斷代標準，並針對器物功能、技法、造型及鑄品與鑄工的關係、成分分析等一併討論。但以一館標本終究無法完全反映宋以後青銅器所牽涉的複雜議題。90年代，更有以宋以後青銅器類比美歐洲義大利14世紀的文藝復興。⁸把宋以後青銅器從藝術史研究的邊緣給予新視野。

無可諱言的，20世紀以來有關宋以後銅器的研究，華人世界起步較晚。相對於中國學界的罕見相關著作，⁹臺灣學界配合民國89年（2000）故宮宋代文物大展，李公麟《考古圖》在北宋的古器物學被重新定位；¹⁰傳世宋代的仿古銅器與宋代古器物學的興起的關係被強調，討論宋古器物學的興起及宋仿古銅器是士大夫與朝廷相互激盪下，為「再現三代」所作的復古運動的物質表現及學術成果，是儒學在宋代的再受肯定，以及將三代銅器樣本與聖人所出的時代等同的結果，而徽宗朝及其周邊大臣更在這種復古運動中流露出政治考量。¹¹更有從宋代的官方因素論及宋皇室如何影響到宋代瓷器的風格，而形成「官樣」，這種瓷器仿銅器之古樣，是官樣的重要內容之一；¹²此外，宋以後青銅器及其他相關質材的仿銅品，在近60年已累積相當數量的考古資料，帶有地區及時代訊息的材料，如四川窖藏也經批判性地強調其道家脈絡。¹³

7 Ross Kerr, "A Preliminary note on some Qing bronze types," *Oriental Art*, vol.XXXI (4), 1980/81, pp.447-456; "The Evolution of bronze style in the Jin,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Oriental Art*, vol.XXVIII (2), 1982, pp.146-158; "Metalwork and song Design: a bronze vase inscribed in 1173", *Oriental Art*, vol.XXXII (2), 1986, pp.161-176, Ross Kerr, *Later Chinese bronze*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990).

8 Robert D. Mowry, *Chinese's Renaissance in Bronze, the Robert H. Clague Collection of Later Chinese Bronze 1100-1900* (Phoenix: Phoenix Art Museum, 1993). 該書雖以「文藝復興」一詞對宋代青銅器給予崇高的歷史地位的評價，唯其言簡，對此一歷史新評價從未做更深的剖析，而其與歐洲文藝復興的情境比附，在本質上，二種文藝復興的異同也未做申論。

9 陳夢家，〈宋大晟編鐘考述〉，《文物》，1964年第2期，頁52-53；王世民，〈北宋時期的制禮作樂與古器研究〉，《揖古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135-138。唯近日李零出有《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具有啟發性。

10 張臨生，〈李公麟與北宋器物學〉，《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19-46。在此之前，Robert Harrist Jr.，也已對李公麟的作為古董家及藝術家及對中國早期的研究，已多所著墨，見Robert Harrist Jr., "The artist as Antiquarian: Li Conglin's study of Early Chinese Art," *Artibus Asiae*, Vol. 55, no.3-4 (1995), pp.237-280.

11 陳芳妹，〈再現三代〉，《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頁293-320；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0期（2001年3月），頁37-160。

12 蔡玫芬，〈官府與官樣——淺論影響宋代瓷器發展的官方因素〉，《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頁321-327。

13 謝明良，〈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2001，頁141-169。

民國92年（2003）國立故宮博物院「古色」研討會中，更有以中國古銅器為例，試圖將古物的復古放在創新的觀照中，給予理論化，析分出三種復古現象：一為「再創新」（Recreation），為瞭解古物原始功能、紋飾、形制而加以有意的模仿創造。二為「古董主義」（Antiquarianism），由於真古物有限，往往因大量需求而仿品充斥。三為「仿古主義」（archaism），以別的質材仿銅器的某些特徵，¹⁴為宋以後千年來古器物的復古運動歸納出較清楚的概念。

本文以上述研究成果為基礎，試圖以新近考古材料，特別是未經解讀或已被解讀但卻被忽視的面向，包括出土情境、器群關係、銘文及墓主身份等，以結合文獻紀錄，簡選代表器群，試圖重建人與物的可能關係，包括如人以其社會、政治身份地位與物的使用脈絡間的互動等，以探索「三代銅器意象」在宋代的再生及其背後動力。包括古銅器從被「散棄」到「考古」到「玩古」的觀念的改變，觀念所來自的贊助階層的社會、經濟、政治與宗教基礎的擴大與變遷，促使再生現象一步步的深入儒佛道、甚至民間信仰世界，並進入庶民的休閒生活中，因而基本上奠定了元明清持續一千多年的主要發展基礎，以說明此現象對器物藝術史的影響。新近考古材料雖仍相當有限，重建的歷史情境仍屬斷簡殘篇，本文也不過是從圖像結合文獻，以解讀背後所反映的從「考古」到「玩古」的概念變遷的初探而已。

古銅器，歷經商到戰國，在漢帝國後，基本上已歸於沉寂。漢唐帝國興起，外來接觸的頻繁，銅以外的各種質材包括漆、陶瓷、金、銀等在器物發展史上各擅勝場。漢唐五代之間，過時的商周銅器雖偶爾意外出現，基本上是被留在「怪異之境」，¹⁵罕見有人願意花精神去理解，所謂「散棄於山崖墟墓之間，未嘗收

¹⁴ Jessica Rawson, "Novelties in Artiquarian revival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bronze," 《故宮學術季刊》，22卷1期（2004年秋季），頁1-34。

¹⁵ 「元鼎六年，得鼎汾水上，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改元」，《前漢書·武帝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49冊），卷6，頁20；「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后土營旁，見地如鉤，拊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史記·孝武帝本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43冊），卷12，頁13；「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前漢書·郊祀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46冊），卷25下，頁九；「（永平）六年在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後漢書·明帝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49冊），卷2，頁13；「初，孝王有雷鼎，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前漢書·文王三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47冊），卷47，頁7；（劉）杳少好學，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項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墓，又得此二樽，形亦為牛象。二器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劉杳列傳》，《梁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60冊），卷50，頁18。以上請參閱容庚，《宋代古金書籍述評》，《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

拾」，¹⁶ 正生動描繪宋初士大夫感同身受漢唐之間古銅器被邊緣化的歷史實情。

宋初士大夫對此種邊緣化現象的觀察與論述，正意味著古銅器在宋代地位轉變的契機。古銅器到宋代，不只無意間出現，且被有意的尋訪、珍藏、研究、紀錄成書；¹⁷ 或被用以銅質仿造其形制、紋飾、或銘文；¹⁸ 或更進而以當代時尚的質材如陶瓷、金、銀、玉等仿造，使「三代銅器意象」間雜在時潮中再生，成為宋及以後器物發展史上的鮮明現象，歷時約一千年，正是宋人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從「考古」到「玩古」的復古概念轉變的結果，本文以追三代於鼎彝之間，以況「三代銅器意象」的「再生」。此「三代」，乃直接引用宋人著錄常用詞彙，意指今日已為考古學證實的商周及仍待確認的夏代。宋人對此時代嚮往既深，並深感受其距宋代之遙，自謂「于今蓋二千有餘歲矣」。¹⁹ 本文用「再生」以強調「三代」與宋時間之遙，及從「邊緣」得以死而復生而被「推崇」的鮮明改變。並以「意象」說明銅器形象的再生，是跨越質材，包括銅、瓷、銀器等，且往往從極準確到只存有少數相近特質等復古程度不一的各種呈現。

呂大臨《考古圖》序，稱「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遺風」；翟汝文《忠惠集》附錄稱「考禮於夏商之器，正字於鼎彝之間」；翟耆年《籀史》〈李伯時考古圖五卷〉，又稱「鼎彝之學」。本文採用宋人的通用詞彙及意念，以「追三代於鼎彝之間」以況宋代「三代銅器意象再生」的歷史現象。

二、士大夫新價值觀及「三代銅器」的「考古」與流動

古銅器從被「散棄於山崖墟墓之間」、「未嘗收拾」，到成為宋人的「三代至寶」，與宋初新興「士大夫」階層所賦予的新的價值觀有關。呂大臨（1046-1092）即用「士大夫」一詞稱呼一群珍愛古銅器的收藏階層。²⁰ 包括寇準（961-

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1934），頁1，後經修改補充後，收在容庚，《頌齋述林——宋人著錄金文叢刊》（香港：翰墨軒，1994）。

16 歐陽修，《集古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81冊），序。

17 宋人自稱是「考古」、「博古」或「金石學」，亦即是Rawson的“Antiquarian”。

18 宋徽宗稱為「仿」（如〔政和璽〕銘文所言，「皇帝肇仿禮器作」，見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187），民間則稱為「偽古銅器」，並興起辨偽的論述（趙希鵠，〈仿古銅器〉、〈銅腥〉，《洞天清錄璽》（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71冊），亦即是Rawson的“Recreation”）。

19 （宋）劉敞，〈先秦古器記〉，《公是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95冊），卷36，頁15。

20 （宋）呂大臨，《考古圖》，序。今存《考古圖》版本有元大德三年（1299）陳翼子刊，明黃德時、黃德懋刻本，由丁雲鵬圖繪的泊如齋版（臺北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善本，北京圖書館善本）；及元羅更翁考定鄭樵校本；清乾隆十八年（1753）序的黃晟亦政堂刊本；或四庫全書本等；本文採用泊如齋版，以其根據元陳翼子版而來，圖繪較細膩近真之故。

1023)，文彥博（1006-1097），劉敞（1019-1068）、蘇頌（1020-1101）、蘇軾（1036-1101）、李公麟（1049-1106）及呂大防（1027-1097）等計37家，237器。²¹ 他們基本上通過科舉，以進士入仕。當時的進士科考試，內容無論是「九經」、「五經」或「三禮」，皆與三代有關的經典為主。²² 銅器的器名、器用等等散見其中。歐陽修即紀錄真宗時科舉考試，雖以文辭取士，必視其器識。²³

三代銅器在宋以前的漢唐之間之被忽視，可能與向來研究三代經典的態度有關。一般士人讀經，多重文字，對文字內容所涉及的視覺形象缺乏「探源」或懷疑的興趣。從漢獨尊儒術到隋唐科舉制度的確立，三代經典已是國家用人任官的主要知識，這些飽學之士在入仕科舉途中，基本上是通過經典及注疏等「文字」說明以認識經典上有關三代銅器的詞彙的，縱或當時已有鄭玄等所圖繪的禮圖，歷代且經修正，²⁴ 也罕見有質疑其確實性的問題。換言之，「文字」認知，與文字所指稱的「實物」之間，彷彿是缺乏交會的兩條線，罕見有人試圖、或覺得必要使其交會。宋人哀古銅器散棄於山崖墟墓，正足以況此情形，也是宋人所說的「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的「名存實亡」²⁵ 時期。此讀經態度為宋初聶崇義的《三禮圖》所踵繼。該書附有圖示，雖顯示在文字之外，時人對視覺圖像的需求，但圖像是「尊文釋器」的結果。這種情形，在聶崇義的《三禮圖》於建隆三年（962）為宋太祖採用，到成書並圖繪於國學宣聖殿的至道二年（996）²⁶ 之後仍未改變。

但從宋初到呂大臨《考古圖》於元祐七年（1092）成書，約一百年間，古銅器在士大夫的觀念中，則有關鍵性的改變。新興的士大夫階層如劉敞（1019-1068）、歐陽修（1007-1072）、呂大臨等，扮演要角，在士大夫間形成收藏三代銅器風氣及士大夫的新文化論述。這群士大夫使古銅器從「散棄」於墟墓之間，

21 根據元《大德版》的《泊如齋》版《考古圖》及鄭樵校本皆有收藏家頁，唯清亦政堂、四庫版已刪除。

22 金中樞，〈北宋科舉制度研究〉，《新亞學報》，6卷1期（1964年），頁205-281；金中樞，〈北宋科舉制度研究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5期（1978年7月），頁134-243；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頁161。

23 （宋）歐陽修，《歸田錄》，卷1，頁14，即紀錄有徐鉉參加科舉，以「鑄鼎象物」條為第一人，由於深知鼎的形制，並藉以喻王臣，所謂「足惟下正，詎聞公餘之欽傾，鉉仍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

24 《宋史》，卷431，列傳第190，儒林一，頁12795。

25 （宋）歐陽修，前引書，卷1，頁10。

26 （宋）王應麟，《玉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944冊），頁996-1092。

成為「考古」的珍寶。古銅器也從墟墓之間，隨著士大夫的仕宦之途而流動於人間。

劉敞便是通過進士，於嘉祐六年（1061）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²⁷安撫使，而治在長安。²⁸ 這個已飽讀禮書等儒家經典的士大夫，正在文字堆中²⁹「哀三代之愈遠」，嘆「三王之事萬不存一」之際，因任官地近周舊都之便，從耕夫牧兒手中驟得三代銅器，對「于今蓋二千有餘歲矣」的銅器，形制紋飾銘文鑄作之精巧，發出「獨器也呼哉！」的驚嘆，而視為「三代至寶」。³⁰ 他加以研究，深知年代懸隔久遠之銅器，後世僅能十得五六，莫能盡通。因此興起永久收藏之法，請二人「模其文，刻于石，並圖其象」企圖使銅器的銘文圖象得以傳之久遠，實深知透過此視覺形象的「器」，可使「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³¹ 他從形制的名物研究中，檢驗只從文字尊文釋器的聶氏三禮圖之誤，³² 發現實物材料檢證文字認知的重要性，終於在宋初形成了革命性的經典研究態度、論述及士大夫階層特有的知識與生活品味、友誼觀、價值觀。劉敞不只將銘文拓片，送給有意於集金石銘文的歐陽修，成為士大夫間傳達友誼及論學的禮物，歐陽修更在嘉祐四年（1059）函謝書簡中表達得到寄來的古器銘時，「發書驚喜失聲」，致使「群兒曹走問」。且告訴劉敞，「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為世俗所憎邪？」二位飽讀經學的大師，在分享此三代視覺材料所帶來的知性與感性的饗宴中，透過三代銅器，共享與三代認同的喜悅，而使他們與無法取悅的其它世人階層區分開來，成為士大夫階層的身分符號。³³

劉敞以經濟行為，從耕夫牧兒手中「購得」，使得墟墓間未嘗收拾的三代銅器，透過感性的欣賞與知性的探索，成為「三代至寶」的擁有者，這種對三代古銅器的品味，正在飽學儒家經典的士大夫階層間傳佈開來，士大夫以收藏具體的

27 熙寧五年十一月，分陝西路為永興軍、秦鳳兩路。見楊仲良，《資治通鑑長編記事本末》（永和：文海出版社，1967），卷240。

28 （宋）歐陽修，前引書，前引卷，頁13。但依歐陽修〔〔宋〕歐陽修，《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76冊〕寫給劉原父五封書簡，知原父在嘉祐二年至四年間（1057-1059）已在長安，並在嘉祐四年歐陽修收得其送達的《韓城鼎》銘及《博山槃》記。

29 劉敞的著作有《劉氏春秋傳》、《劉氏春秋意林》、《公是弟子記》、《公是集》等，這些書中出現「三代」詞者有三十四處之多。

30 （宋）劉敞，《公是集》，卷1，頁1；卷36，頁15。

31 （宋）劉敞，前引書，卷36，頁15。

32 如《叔高父旅簋》〔〔宋〕呂大臨，前引書，卷3，頁35〕，原父在長安得此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之似龜，有首有尾有甲有腹。原父比對當時禮家（即聶崇義的《三禮圖》）的簋，卻形制如桶，龜形蓋〔〔宋〕聶崇義，《三禮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9冊〕〕等不同。

器，以坐擁三代，所謂「追三代於鼎彝之間」，三代銅器也在這種新興的價值觀下，從墟墓間、透過經濟行為，隨著士大夫的宦海浮沉，做空間流動，及文化價值的轉換。

以劉敞為例，臨江新喻人，³⁴ 慶曆年間（1041-1048）進士，《宋史》³⁵ 稱其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歐陽修則屢提及劉敞在嘉祐元年（1061）以翰林侍讀學士，任官長安，從耕夫牧兒手中，購買三代銅器，運回京城，「所載盈車」的生動景象。檢證《考古圖》所稱臨江劉氏十一器，出土地點包括西周都城及周原，如扶風、藍田、盤屋、驪山，且及於更西北的韓城等地（圖1），³⁶ 這些銅器，基本上皆有銘文，其銘文、形制、紋飾，從今日考古學的知識看來，確實帶有周代鎬京一帶帶銘銅器的風格，充分展現宋初士大夫從所獲三代標本以認知三代的學術基礎。

劉敞在研究其收藏後，書成《先秦古器記》，³⁷ 今雖已佚，但《集古錄》卻錄其銘文，《考古圖》則圖文並存，成為當時士大夫藏家的重要類型之一。

另一藏家李公麟（1049-1106），舒洲人，³⁸ 第進士後，歷任南康、長垣尉、

33 歐陽修並告知劉敞，對其未能識讀處，將尋訪博識者尋繹（〔宋〕歐陽修，《文忠集》，卷148，頁12）。專家楊南仲、章友直解讀釋文，蔡襄並對《叔高父旅簋》說出「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而以劉敞所目見的真器，正可「正其謬也」（〔宋〕歐陽修，《集古錄》，卷1，頁11），以推崇新的視覺材料，對認知三代的重要性，以及分享認知過程的喜悅的士大夫交友圈。

34 《考古圖》稱為臨江劉氏。

35 《宋史》，卷319，列傳78。

36

器名	出土地	資料來源
〔弁敦及蓋〕	扶風	《考古圖》，卷3，頁7
〔伯庶父敦〕	扶風	前引書，前引卷，頁12
〔伯百父敦〕	原驪山白鹿	前引書，前引卷，頁19
〔中言父旅敦〕		前引書，前引卷，頁21-2
〔□敦〕	盤屋	前引書，前引卷，頁
〔晉姜鼎〕	韓城	前引書，卷1，頁6
〔公誠鼎〕	上雒	前引書，前引卷，頁9-10
〔叔高父旅簋〕	扶風	前引書，卷3，頁34
〔鉅中匪〕		前引書，前引卷，頁43
〔鉅伯旅匜〕	藍田	前引書，卷6，頁4-5

37 （宋）劉敞，前引書，卷36，頁15。

38 《宋史》列傳，卷444，列傳第203，文苑6；《考古圖》稱為廬江李氏。

泗州錄事。³⁹ 後任職京城，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考古圖》收錄其藏器計25器，其中〔己舉爵〕、〔父己人形彝〕、〔獸環細文壺〕及〔戈〕⁴⁰（圖1）皆得自南方壽陽紫金山⁴¹，可能是在其任職南方時，使它們從墟墓之間成為三代至寶的，並在京城任官時為呂大臨所目驗入書。從今日的考古認知看，其戈上有鳥蟲書銘文，正指稱其為蔡國之器，帶有南方地方特色。至於其它藏器則大多得自京師。⁴² 《宋史》載李公麟「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⁴³ 可見李公

39 查《宋史》地理志知皆在江南。

40 （宋）呂大臨，《考古圖》，卷5，頁4；卷4，頁33-34；卷4，頁64；卷6，頁16。

41 「清塞周立，指揮二，其一北蕃歸附之，營壽州；其一破淮南紫金山岩所得騎軍，營延州。」見《宋史》志，卷187，志第140，兵，禁軍上建隆以來之制。

42 李公麟收藏古銅器的出土來源：

器名	出土地	資料來源
〔庚、辛、癸〕鼎	京師	《考古圖》，卷1，頁1-3
〔挈壺〕	河潼	前引書，卷4，頁49
〔召中考父壺〕	京師	前引書，前引卷，頁51
〔父丁爵〕	新鄭	前引書，卷5，頁1
〔己舉爵〕	壽陽紫金山	前引書，前引卷，頁4
〔觚〕	京師	前引書，前引卷，頁16
〔鄭方鼎〕	新鄭	
〔丁父鬲〕		《考古圖》，卷2，頁1
〔四足疏蓋小敦〕	京師	前引書，卷3，頁29
〔三牛敦〕	京師	前引書，前引卷，頁30
〔簠蓋〕	京師	前引書，前引卷，頁50
〔單從彝〕		前引書，卷4，頁10
〔虎彝〕	新鄭	前引書，前引卷，頁18
〔父己人形彝〕	壽陽紫金山	前引書，前引卷，頁22
〔主父己足迹彝〕	京兆	前引書，前引卷，頁23
〔持戈父癸卣〕	京師	前引書，前引卷，頁32
〔父己足迹卣〕		前引書，前引卷，頁35
〔象尊〕		前引書，前引卷，頁40
〔足跡壘〕	鄴	前引書，前引卷，頁42
〔獸環細文壺〕	壽陽紫金山	前引書，前引卷，頁45
〔龍文甗〕	京師	前引書，卷5，頁21
〔仲姑旅匜〕	京兆	前引書，卷6，頁6
〔弩機〕	婺之蘭溪	前引書，前引卷，頁11
〔戈〕	壽陽紫金山	前引書，前引卷，頁12
〔削〕	京師	前引書，前引卷，頁14

43 《宋史》卷444，前引文。

麟也是透過經濟行爲，擁有三代銅器，並經研究，以成爲三代至寶，成其書《考古圖》。⁴⁴

又如蘇軾（1036-1101），乃眉州眉山人，嘉祐二年（1057）中進士，再中六年制科，可能在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⁴⁵時在附近終南山得一古敦，歐陽修稱其爲「終南古敦」，得其銘，並稱此實物正證實《三禮圖》所畫與真古物的形制不同。⁴⁶惜呂大臨《考古圖》未收此器而無法詳其制，唯《考古圖》收錄另一藏器，「楚邛仲嬭南和鐘」（圖1），稱得自錢塘，⁴⁷查蘇軾傳記曾兩度官任杭州，⁴⁸或許在其二度外任杭州得到的。

此外，文彥博（1006-1097）爲汾州介休人，天聖五年（1027）中進士入仕途，藏有「王子吳鼎」⁴⁹等計12件，其中除五件不知所從得⁵⁰外，有五件如「王子吳鼎」、「仁旅鬲」、「單伯彝」、「伯玉叔盃」、「季姬匜」等皆得于京兆，京兆府屬永興軍節度，即今長安，⁵¹查文彥博在至和二年（1055），正是自

44 （宋）翟耆年，〈李伯時考古圖五卷〉，《稽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81冊），卷1。

45 《宋史》，卷338，列傳79。

46 （宋）歐陽修，前引書，卷1，頁10。

47 （宋）呂大臨，《考古圖》，卷7，頁11。

48 在王安石熙寧變法時因反王安石而曾通判杭州，哲宗即位，元祐四年（1089）請外拜龍圖閣士，知杭州（《宋史》，卷338，列傳97）

49

器名	出土地	資料來源
「王子吳鼎」	京兆	《考古圖》，卷1，頁24
「乙鼎」	鄴郡韋甲城	前引書，前引卷，頁28
「奔口鬲」		前引書，卷2，頁3
「仁旅鬲」	京兆	前引書，前引卷，頁10
「垂環鬲」		前引書，前引卷，頁14
「文足甗」		前引書，前引卷，頁24
「圓甗」		前引書，前引卷，頁25-6
「細文鬲」	滎陽	前引書，前引卷，頁29
「口耳足敦」		前引書，卷3，頁28
「單伯彝」	京兆	前引書，卷4，頁19
「伯玉敦盃」	京兆	前引書，卷5，頁25
「季姬匜」	京兆	前引書，卷6，頁7

50 值得注意的是五件中至少有四件部分特徵皆罕見於現今的考古出土器中。

51 郭黎安，《宋史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2003），頁80，據《元豐九域志》卷3，《輿地廣記》卷13及《宋志》。

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知永興軍。⁵² 文彥博其餘收藏則得自鄴郡覃甲城及滎陽，與文彥博長久任職中央的京城及晚年致仕後長居洛陽⁵³ 皆近。⁵⁴

從劉敞、李公麟、蘇軾、文彥博等紛紛成為古銅器的收藏家，並檢驗其藏品的出土地點以及他們來往於中央及地方的仕宦歷程來看，顯然這批透過科舉進士入仕的士大夫，在其宦海浮沉的地理空間流動中，正如蔡襄所形容的，「今之仕者，東西南北或千萬里」，⁵⁵ 他們成為促使三代銅器作空間流動的主要贊助者。

這批通過科舉制度的士大夫階層，與唐五代比較，被認為得到較高政治地位，受到焚香禮進士，⁵⁶ 他們在宋初，正以祖述三代自居，以重振儒家，以調整漢唐以降佛道當道的局面。三代銅器正成為三代的象徵符號，他們往往願意投注金錢，在所不惜。如李公麟「聞一妙品，雖千金不惜」。而北宋前期，據研究，宰相的月俸300貫，縣令只10-20貫。⁵⁷ 他們雖不一定個個必然對古銅器的名物之學作透徹的研究。像東坡的「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⁵⁸ 自以為猶識「鼎」，卻當胡穆秀才誤將前流後尾上有兩柱的三足器「爵」視為「鼎」時，只能質疑，而無以名之。⁵⁹ 但蘇軾在士大夫階層中仍成為少數二、三件的收藏家、愛好者。又如文彥博、寇準等，對三代義理多所申述，⁶⁰ 但也止於收藏家。本文稱為第一類士大夫，他們為三代銅器意象的再興立下了最基本的「收藏」前提，以開風氣之先。

52 《宋史》表卷211，卷第二，宰輔二。

53 《宋史》列傳卷313，列傳72。

54 郭黎安，前引書，頁41。

55 (宋)蔡襄，〈陳殿丞送行詩序〉，《端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90冊)，卷29。

56 余英時，〈宋代「士」的政治地位〉，《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出版社，2003)，上篇，頁271-312。

57 黃惠賢、陳鋒編，《中國俸祿制度史》(武漢：武漢大學，1996)，頁297-299；250-251；王曾瑜，《宋朝階層結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261-262，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專刊102，2001)，頁52。

58 (宋)蘇軾，《東坡集》(北京：線裝書局，2002)，卷6，頁2。

59 胡穆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可以覆而不蹶，以為鼎，則不足，疑其飲器也，胡有詩答之。「隻耳獸鬻環，長脣鵝擘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高張秋菌細。君看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兩髻。古書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作鼎，纔注升合已漂逝。不如學鴟夷，盡日盛酒真良計」。(宋)蘇東坡，《東坡集》，卷5，頁15，或許是因為蘇軾正處在宋初士大夫初識三代鼎彝的早階段，但從蘇軾著作等身但卻罕談這類知識看，與三代銅器有關的名物之學在四川蘇學的發展中，可能不是重點(參胡昭儀、劉復生、粟品孝，《宋代蜀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7])。

60 (宋)文彥博，《潞公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00冊)，卷1，8，9，12，20；(宋)寇準，《忠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24冊)。

士大夫收藏家在距三代已有二千年的宋代，為三代銅器意象的再生盡收藏原跡之責，使懸隔久遠的物的「形象」從墟墓間開始移動，進入了士大夫及其朋友的生活視野中，與那些以文字紀錄三代知識的經典並列。唯有真正視覺形像的存在，才能激發士大夫猶如面對古代經典般，去了解或詮釋古銅器，更進而發現它們可以糾正經典注疏的謬誤。劉敞、李公麟，進而為收藏著書立說，成書《先秦古器記》及《考古圖》，⁶¹皆闡述了新興的視覺材料在名物研究方面的新視野。是為宋初第二類型的士大夫。劉敞的「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正說明士大夫所從事的三代經典的各方面的學問中，禮家、小學家及關心譜牒的史家，對三代銅器的學術性的關注，所建立的新知識範疇。這種對銅器的重視及紀錄，所引發的新興的知識概念，成為金石學中的金學部分，在有宋一代蔚為風潮，使得鄭樵的《通志》須特創〈金石略〉⁶²以記一代新知識，強調文獻經典之外，親近不朽金石以了解三代的時代新潮流。

士大夫收藏三代銅器的風氣，使得呂大臨（1046-1092）雖不是收藏家，但以學自張載二程，作為程門四先生之一，博通六經，尤遂於禮的禮家，⁶³得以集結37家，273件器的足夠標本，建立其「觀其器、誦其言」以理解三代銅器，以追三代遺風的基本原則，⁶⁴體系性的金石學得以成立，以「探制作之原，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成為第三類的士大夫。並進而為道家批評儒家「逐迹喪真」辯護，分辨「逐迹」與「玩物」的不同，建立儒家面對器物的「考古」學術基礎。⁶⁵

宋初士大夫「逐迹」與「玩物」之辨，在往後有關器物的著作中，往往成為捍衛儒學的宋士大夫面對器物時刻意辯解的議題，⁶⁶這種面對三代銅器之為「物」時，盡可能壓低「玩物」的傾向，或試圖與之劃清界線，使得三代銅器作為「物」的感官部分成為宋初士大夫較少去探索的範疇，而留給別的階層，如下文所稱南

61 二書目前雖已亡佚，但論說部分殘存於劉敞的《公是集》、歐陽修的《集古錄》，圖像則保存在呂大臨的《考古圖》中。

62 （宋）鄭樵，《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372冊），卷73。

63 《宋史》，卷340，頁9下；《宋元學案》，卷31，頁7。

64 有關其所建立體系的具體內容，請參閱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0期（2001年3月），頁48-55。

65 （宋）呂大臨，〈考古圖記〉，《考古圖》，頁12。莊周氏謂：「儒者逐跡喪真，……」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非取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遺風。

66 歐陽修之子棐為《集古錄》作跋尾時，亦不忘提到「豈徒於嗜好之僻而以為耳目之玩哉？」；趙明誠（1081-1129）在其《金石錄》原序中強調「非特區區為玩好之具而已」（趙明誠，《金石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52冊），原序，頁681）。

宋的「塵外之客」去發展。

倒是歐陽修對宋初士大夫的「逐迹」古物有率真豁達的剖析，發表其收集古「物」的哲學基礎，在「好」及「力」的結合，這點結合，使人上天下海尋獲自然資源，以成金石珠璣、湯盤孔鼎，強調身為士大夫之好盤鼎，是大別於世人之好「金玉珠璣」的，縱或二類皆在「物」的共同規律下聚散不定，但士大夫仍以珍藏三代銅器及石刻為其「好」，建立「好」或「玩」之屬於士大夫群的價值標準。三代銅器的收藏，成為這群士大夫之有別於收藏金玉珠寶的世人，同時，也發現著書立說，正是士大夫長保聚散不定的物質材料的重要方法。⁶⁷

總之，士大夫處在三代論述一再被強調，以肯定儒家地位的宋初，⁶⁸ 在經學研究上傾向越過漢唐注疏，直接面對三代經典，在文學上，強調韓愈以降的古文運動。三代銅器的價值正在這種氛圍中，為宋初士大夫所發現、珍藏、研究，並成為士大夫及其交友圈中論述切磋的重要內容。其中，具有這類知識及卓越的見解者，往往不只贏得士大夫圈的尊敬，甚至皇帝也包括在內。這種士大夫因研究古銅器所發展的學問乃以名物之學為重，是放在禮學家對禮及禮器的關注範圍內的。因此，如錢塘人沈括（1029-1093）雖以天文學等博物洽聞為其特色，且成為三代銅器的收藏家，嘉祐八年進士（1063），晚年於元祐（1086-1093）初卜居夢溪時，論其所收藏的三件銅器，以「器用」分類之，他也如一般士大夫一樣，走入當代學風中，對名物問題多所討論，對舊禮圖之失加以強調。⁶⁹ 可惜並未以其科學的知識連帶關注到古銅器的科技面。這類關注直到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始粗具體系性的論及冶鑄的議題。但是書序仍不免自稱是「大業文人棄擲案頭的知識」，「于功名進取，毫不相關」，⁷⁰ 這種自嘲，事實上在宋初士大夫對銅器的重視及研究取向方面已顯端倪。

當然，士大夫對三代銅器並不僅止於「收藏」及「研究」，且進而關注到根據真正三代銅器意象，推展到地方州縣祭孔的重要性，使得三代意象從士大夫收藏的「私有領域」轉至地方上的「公共場域」中，與孔廟、甚至書院相連，成為

67 李清照在紹興二年（1132）為其夫趙明誠《金石錄》寫跋時，生動描述其收藏形成過程所經歷的物力上的拮据、面對材料的喜悅，以及北宋遭金兵兩遷收藏喪失等物的「聚散」及著書的必要性等，見趙明誠，《金石錄》，後序，頁1-6。

68 余英時，〈回向三代——宋大夫政治文化的開端〉，《朱熹的歷史世界》，頁255-285。

69 （宋）沈括，《夢溪筆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62冊），卷19，頁1-3。

70 （宋）宋應星，《天工開物》（臺北：臺灣商務，1987），卷序。

儒家的物質表徵。關鍵人物是朱熹（1130-1200）。事實上，孔子的地位在政治社會中，從唐代以來已在提高中。中央已下令州縣皆立孔子廟，《大唐開元禮》中的吉禮即有〈諸州釋奠於孔宣父〉卷，描述所用祭器的種類及儀式。⁷¹ 到宋代，皇帝對孔子的禮遇日隆，孔廟之禮儀也隨之增榮。⁷² 《政和五禮新儀》吉禮亦立有〈州縣釋奠文宣文儀〉卷，⁷³ 唯二禮書皆只形諸文字。朱熹在此氛圍下，於淳熙六年（1179）以地方官知南康軍上書，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深淺尺寸等。關心地方州縣祭孔的儀式及祭器，闡述實踐禮時，祭器於古有據的重要性，以為祭器須如政和年中議禮局所繪，因為它們是考三代器物遺法而來，不能仍沿用聶氏舊圖之陋，⁷⁴ 朱熹因此上書中央頒布《紹熙州縣釋奠儀圖》，該圖與銅器有關的器制，只選擇圖繪十三種，作為祭孔的主要器類的形制依據，包括〔豆〕、〔簠〕、〔簋〕、〔犧尊〕、〔象尊〕、〔太尊〕、〔著尊〕、〔壺尊〕、〔洗〕、〔爵〕、〔龍勺〕等（圖2）。

使成定制，且隨著祭孔行為，應用在宋元所盛行的私人講學的書院中，使三代銅器意象隨著孔子地位的步步高升及朱熹學的影響力而散佈開來。雖然，有關宋代的祭孔祭器仍待系統發掘，但目前已出土的元明二代祭孔祭器的實例，可以部分瞭解其長遠的影響力。如湖南博物館收藏的，依銘文知是大元大德己亥年（1299）文靖書院的一套祭器，包括八件簠，四件豆，紋飾形制與釋奠儀圖雖不盡相同，但主要器類及基本形制相近。國立故宮博物院有至正廿六年（1366）銘永澤書院祭器⁷⁵（圖3-1），也應是元代在書院祭器傳統中的仿三代器。《朝鮮王

71 （唐）蕭嵩等，《大唐開元禮》卷69。

72 黃進興，〈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談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卷4期（1990年12月），頁920-922。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下詔追諡孔子為「玄聖文宣王」，五年（1012）改諡為「至聖文宣王」（扈扈，《宋史》，卷105，頁2548；卷8，頁152）；徽宗崇寧三年（1103），增文宣王冕十有二，改宣王殿為「大成殿」（《宋史》，卷105，頁2549-2550）。南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復釋奠文宣王為「大祀」，州縣為「中祀」（〔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4，頁15）。

73 （宋）鄭居中等，《政和五禮新儀》卷126。

74 「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崇義圖義，皆諸儒臆說，於經無據，國子監三禮堂實存圖繪，下至郡縣學，間亦有之，不足示學者。直紹儒臣編次方今禮樂新制器用，直繪於圖，著其義，具為成書頒焉。詔三禮圖及郡縣學繪圖象，並改正舊所繪兩壁三禮圖並毀去。宣和元年（1118）五月二十七日，詔諸州，祠祭器；令禮制局繪圖頒降，依圖製造」（王令麟，《玉海》卷56，頁15-16。）唯紹興十五年（1145）朱熹在州縣所見到的「今州縣既無此本，而所頒降儀式印本，尚仍聶氏舊圖之陋。」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四明美術，1988）別附，卷1，頁6。

75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481482；石守謙、葛婉章編，《大汗的世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120，圖IV-3。

朝的實錄》中的〈世宗實錄〉五禮中，吉禮序例中的「祭器圖說」（圖3-2）⁷⁶所繪的圖即明言部分採自「朱文公釋奠儀」。⁷⁷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收藏有朝鮮李朝青瓷簋（圖3-3）及簋等，⁷⁸韓國金羅南道新安郡智島邑防築里道德里的海中沉船打撈的仿古銅器及瓷器（圖3-4），⁷⁹或許部分也可放在此系統的脈絡中理解。四川大竹窖藏出土，帶銘的明代弘治乙丑年（1505）大竹縣事劉永成造的祭孔祭器143件，⁸⁰足見其影響之久遠。

朱熹的提倡，使得孔廟及書院祭祀系統成為仿製「三代銅器意象」的贊助者及普及者，也使得士大夫階層從「收藏」及「研究」，更進而以地方官吏的身分，贊助「仿製」，這些行為並成為衡量地方官吏的價值標準。⁸¹三代銅器意象得以由廟堂及於地方性的州縣孔廟及書院釋奠之禮。其所使用的意象，一方面在普及中，選擇性地簡化了三代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使得三代銅器意象成為儒家的象徵符號，⁸²並附麗在儒家影響力，以及儒家所依附的科舉考試以入仕制度的發展中，擴展其再生的力量。

三、皇室新價值觀與仿古

如同掌握宗教權力的教皇Julius II及Innocent VIII等，及掌握政治權力的皇室

76 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漢城：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63），五，頁180-187。

77 （宋）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據考證今存版本只有三種，即四庫底本、四庫全書本、指海本，均為清以後版本。王光熙、王燕均校點《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校點說明，頁3；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查「指海本」（乃清錢熙祚校刊，培讓、培杰續刊，為《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書局，1967）所收錄於845冊，其圖繪與四庫本（648）有出入，指海本稍詳。）至於朱熹是否確是《紹熙州縣儀圖》作者，學界的論證，亦請參閱校點說明。

78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等，《ひのセキモの李朝—朝鮮時代の陶磁》（東京：讀賣新聞，2002），頁26，圖7；頁42，圖23，稱為「粉青家畝雷文祭器」及「粉青線刻花文祭器」；片山まひ，〈再生産される威信財〉，《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千葉縣佐倉市：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2002），94，頁3-14；感謝謝明良教授提供相關研究資訊。

79 文化公報部、文化管理局編，《新安海底遺物》（漢城：同和出版社，1981）。

80 余和年、鄧章泉，〈大竹出土明代銅器〉，《四川文物》，1994年1期，頁72-73。

81 宋初梅堯臣（1002-1060）即讚美慶曆六年（1047）新息地方官張君仲在「修孔子祠及祭器」的治績，並以之與發揚孔子之道相連（梅堯臣，〈新息重修孔子廟記〉，《宛陵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28冊〕，卷31，頁1-2）。

82 宋士大夫除成為堅強的「收藏」、「研究」及提倡力求以於典有據的仿品祭孔外，南宋江南的士大夫更進而以「三代銅器的仿品」隨葬於墓中者，以永遠陪伴死者的來生。與朱熹時代相近的南宋浙江平陽的黃石（1110-1175）即是以「仿三代銅器意象」的銅器，包括一件銅鐘、二件小銅方壺（高9.4公分）（圖4）、一件小銅鼎（高13.5公分），與一件銅鏡及五件時尚的黑褐色釉瓷罐並列，以別於其妻（除與其相同的五件黑褐色釉瓷罐外），後者隨葬時尚質材的影青成形的一件小瓷盒。依墓誌銘，黃石為紹興八年（1138）進士，任福州州學教授，後來在專門培養皇帝子弟的「宗學」

如法王Francois I等，他們在羅馬銅雕意象在十六世紀歐洲再生上扮演要角，⁸³宋皇帝在宋士大夫所圍繞的政治圈及三代論述氛圍中，也成為三代銅器意象再生的有力贊助者，且有其特殊性。三代銅器意象在宋皇帝手中，成為皇室祭禮中祭器仿製的典範，這種稽古新作，在代表三代的保護傘下，是重建社會秩序、君臣秩序、且在黨爭中壯大聲勢的符號，徽宗尤為關鍵，而大別於漢唐之間的皇帝。後者對三代銅器的基本態度是被動且缺乏客觀認知興趣的。⁸⁴

事實上，由於五代的戰亂，社會失序，重建社會政治新秩序一直為宋代皇帝所關心。⁸⁵不只認為皇權的至高無上及法定地位，在禮儀中得以彰顯，也期望社會及尊卑的政治秩序得以在代表儒家三代典範的儀節中，透過理想中的禮樂教化得以重建，以得到從政士大夫群的支持。這些禮儀及所牽涉的各種器用，對祖述三代、追三代之隆的宋代皇帝尤為重視。這種重視，尤其表現在北宋各朝頻繁的禮制改革及複雜的禮儀中。如太祖時即用聶崇義的《重集三禮圖》、《開寶通禮》、《通禮義纂》等；如仁宗的《禮閣新編》、《太常因革禮》等；神宗的《朝會儀注》以及徽宗的《五禮新儀》等。⁸⁶

但重視禮儀，不必然要重視祭器的是否合於古意，也不必然必須大量收藏三代古銅器。宋初，太祖即位時，正史所載與相關士大夫的聞見紀錄有極有趣的對比。邵伯溫為邵雍子，從小在父親及士大夫官僚群如司馬光等來往的聞見中，生動的描繪太祖質疑儒士輩講究以三代銅器意象作為禮器祭祖的必要性。對太廟祭典的祭器，所謂「籩豆簠簋」等至少是以三代為名的禮器，不只不認識，且調侃懷疑祖宗是否認識，因而命撤去。⁸⁷唯終究仍為儒士輩照章行事而設「向來禮器」。充分流露太祖對三代銅器意象再生，在依違之間的心路轉折歷程。《宋史》所載，則可能已在轉折後，公開採用聶崇義《三禮圖》為三代意象代表，以當時

任教授（葉紅，〈浙江平陽縣宋墓〉，《考古》，1983年1期，頁80-81）。三代銅器意象的贊助者，正來自飽讀儒家經典而入仕途的男性官吏，而非女性。不過，目前所發掘的宋代墓葬中，黃石個案仍是罕見的，或許宋士大夫主要在收藏及祭孔方面推動而已。

83 Francis Haskell & Nicholas Penny, *Taste and the Antique*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

84 同註15。

85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2001），卷2，頁172-184；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頁255-285。

86 《宋史》，卷98，頁2422-2423。

87 太祖初即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為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撤去。亟令進常膳，親享必，顧近臣曰：「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頁5。

認為是有所典據的古禮，協助重建社會及政治秩序。奠定日後宋代皇帝成為三代銅器意象贊助者的基調。唯仁宗皇帝亦雅好三代銅器，且模款賜近臣，但藏器來源仍多屬被動。⁸⁸ 皇祐三年（1051），皇家雖已是「三代銅器」或其仿品的收藏者之一，藏於「秘閣」及「太常」，唯僅十一器，與當時士大夫的收藏規模相比，僅在伯仲之間。⁸⁹

徽宗皇帝（1082-1135，1101-1124主政時期）時，則化被動為主動，以其強大的政治資源、人力、物力成為三代銅器的最大收藏家，及仿製的最大贊助者。《重修宣和博古圖》的成書及現存的〔政和鼎〕（圖5）、〔大晟編鐘〕（圖6）等仿古銅器可為證。

促使徽宗注意禮儀用器須合古意，要合古意，須收藏真正古物標本的，即是兵部尚書侍郎充議禮局詳議官薛昂。其於大觀三年（1108）上奏徽宗正視「有司所用禮器如尊爵簠簋之類，與大夫家所藏古器不類」的事實，改變之方，須禮失求諸野，視墟墓間古器為珍寶。「宜博訪而取資」，並由中央下達地方州縣，「委守令訪問士大夫或民間有收藏古禮器者，遣人往詣所藏之家，圖其形象，點檢無差誤，申送尚書省議禮局，其彩繪物料」，並為之著書立說，終成就了《重修宣和博古圖》。⁹⁰ 唯其收藏的目的，超越當時一般士大夫，是用以改進朝廷中有司所製造的禮器。徽宗這種「三代銅器意象」的現世應用不只有別於一般士大夫，也使得徽宗朝對三代銅器意象的態度與觀念有別於其前的北宋皇帝，在於具體地關心今世有關有司所用禮器意象之是否合於真正「三代古物」。具有高度合於古意的〔政和鼎〕即用以賜給童貫，行於君賜臣以贊助臣的家廟制度，⁹¹ 並用以昭示徽宗與童貫的親密關係及加強其忠誠度。這種君賜臣以仿三代銅器，以行於家廟制度的行為，為南宋所踵繼，如〔紹興豆〕（圖7）等。⁹²

值得注意的是，徽宗給予三代銅器意象再生的符號意義，除了在《政和五禮新儀》中冠冕堂皇的儒家說辭之外，更加入道家色彩。其任用蔡京，進行崇寧年

88 多來自「郡國所獻」，如邢州獻瑞鼎，見翟耆年，前引書，卷上。

89 翟耆年，〈皇祐三館古器圖〉，前引書，卷14，頁15-16；呂大臨，前引書；葉國良，《宋代金石學研究》，1982年。

90 （宋）鄭居中等《政和五禮新儀》卷首，頁14。

91 吾妻重二對宋代所提倡的家廟及祭祖制度有所討論。〈宋代の家廟と祖先祭祀〉，小南一郎編，《中國の禮制と禮學》（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2001），頁505-575。

92 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訪古銅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0期（2001年3月），頁75-76；86-87。

間清除元祐「姦黨」之後，⁹³ 分別在崇寧二年（1104）鑄九鼎，及八年鑄神雷九鼎。⁹⁴ 其所採用的是方士魏漢津及王仔昔的說法，以求備百物之象。其九鼎依方位、色彩、時辰的不同祭祀，蔡京在崇寧四年被任命為定鼎大使，徽宗往往親幸九鼎禮儀，並有百僚陪位。正史《宋史》將此事放在「徽宗崇尚道教」的脈絡中談及。蔡京子蔡絛也對徽宗初鑄九鼎時的神奇景象多所描繪。所謂「千餘鶴飛來，雲為之變色」。⁹⁵ 這種以皇帝之尊，把三代意象與道教的儀式結合，加強了三代意象的非儒家脈絡。三代意象的再生在推崇三代儒家的保護傘下，得以在徽宗朝君臣如蔡京、王黼、薛昂、梁師成、童貫等與其他群臣激烈的黨爭中大行其道。並在道家的色彩中，更擴大其再生力量的基礎。

此外，《重修宣和博古圖》之別於呂大臨的《考古圖》，在於強調三代銅器的象徵意涵，增加時人的臆測。其中最明顯的是對鼎形制特色的申論，所謂「圓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⁹⁶ 結合鼎與官僚意涵，加強了三代銅器意象的當世功利意義，也說明了鼎在三代銅器意象再生中的顯要地位，提供了三代銅器意象從士大夫、皇室往庶民方向推移的可能性。特別是在宋室南遷之後。雖然古物在戰爭中流散，但紀錄徽宗皇室大量收藏的《重修宣和博古圖》，以圖繪的方式，基本上保留了最大宗的三代古銅器標本，繼續在擴增的三代銅器意象的贊助者群中。為南宋以後當真標本不見時，為仿古樹立典範，影響至巨。

南宋時，朝廷所用祭器，往往有以陶等仿銅器的尊、壺、簋、簠的紀錄，《重修宣和博古圖》成為仿古的範本，⁹⁷ 近年浙江杭州烏龜山窯址⁹⁸ 及杭州老虎洞窯址⁹⁹ 出土的瓷器中有相當的三代銅器意象，包括鼎、鬲、觚（圖8）等，學

93 羅家祥，〈「崇寧黨禁」與北宋晚期政局〉，《北宋黨爭研究》（臺北：天津書局，1993），頁276-307。

94 《宋史》，徽宗本紀，卷19，頁368；志卷140，頁2544-46。

95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1，頁10。冶鑄地點在南郊，中夜冶鑄至四鼓時，「忽有神光達禁中，政燭福寧殿，紅赤異常，宮殿於是盡明如晝，殆曉始熄……在旋命其父蔡京為奉安禮儀使，方其講事之際，有幾千萬隻鶴飛來，蔽空不散。翌日，上（徽宗）幸之，千餘鶴飛來，雲為之變色，五彩光艷。往後，用王仔昔之議從九鼎時，亦有「飛鶴之祥，雲氣如畫卦之象」。

96 《重修宣和博古圖》，卷1，頁3-5。

97 《中興禮書》，卷10。有關南宋皇室的陶瓷復古現象，及南宋皇室尋訪到《重修宣和博古圖》的時間點有所論述，參見蔡汝芬，〈官府與官樣〉，《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頁321-337。

9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等，《南宋官窯》（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6）。

99 杜正賢，《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此外，汝窯（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汝窯的新發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圖39，40，119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界往往從皇室的贊助論及官窯的問題，皇室在三代銅意象的銅瓷質材轉換上扮演要角。無論如何，宋以時尚的瓷質以仿三代銅器意象，尤重形制仿製，使得三代銅器意象，特別是形制方面，在銅、瓷質材的轉移中，在皇家強有力的資源贊助下，傳達出宋瓷有別於漢唐瓷器的美感境界，達到銅質所難以呈現的瓷器特質。

四、三代銅器意象的流傳——贊助階層的流動及使用情境的擴大

（一）從儒家到佛教到民間信仰

由於有關士大夫及皇室文獻留下較多，往往導引過去的研究，將三代銅器意象的再生多放在儒家脈絡，以討論其與士大夫、皇室的关系。¹⁰⁰ 新近考古出土文物則提供其在儒家之外的信仰世界，及與士大夫及皇室之外人群的关系。外來佛教香爐器制的「三代化」，提供鮮明的例證。

1. 佛教脈絡

宋初，士大夫以復興儒學為職志之際，佛學也嘗試吸收儒學。¹⁰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代銅器意象的再生上，佛教也是贊助者。宋初呂大臨所走訪收錄的三代銅器的士大夫收藏家群中，佛教寺廟如鄱陽法相院也名列其中。¹⁰² 寺廟對三代文物的典藏也可見於河北定州五號塔基靜志寺出土有戰國到前漢時期的玉璧等。¹⁰³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以後寺廟的香爐造型，與唐代的分野也逐漸明顯。事實上，三代意象之進入佛教世界，已見於五代到北宋初的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宮出土的〔三彩陶爐〕（圖10）。¹⁰⁴ 器身附有雙耳，與三代鼎近，¹⁰⁵ 可見五代到宋

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址2000年發掘簡報〉，2001年11期，頁16-17）及越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越窯寺龍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11期，頁34-39）。

¹⁰⁰ 陳芳妹，前引文。

¹⁰¹ 北宋時期杭州靈隱寺禪契嵩，強調儒佛的共通性，提出了「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不同歸于治」（〔宋〕契嵩，〈寂子解〉，《鐔津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91冊），卷8，頁24；契嵩並以儒學經典中的《周易》、《中庸》、《老子》、《莊子》中的理念及論述說明佛學，「今儒之仁義禮智者，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宋〕契嵩，〈中庸解〉，《鐔津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91冊），卷4）；朱漢民等，《中國學術史》（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宋元卷上，頁27-28。）

¹⁰² 其收藏的是〔龍文三耳卣〕，是從彭澤馬山洞穴出土的。呂大臨說法相院的和尚「傳摹其器以示人」，並誤認為是陶淵明酒壺（〔宋〕呂大臨，《考古圖》，卷4，頁39）。雖然，和尚的理解與身為儒家的呂大臨的考古理解大不同，但寺院在宋初無形中扮演了三代銅器的收藏者，則是可以肯定的。

¹⁰³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頁39-51。

¹⁰⁴ 樊瑞平、郭玲娣，〈河北正定舍利塔基地宮清理簡報〉，《文物》，1999年4期，頁38-43。

¹⁰⁵ 該器與一石函共出，石函所刻銘文知造塔人扈彥珂（其為都部署造塔三司隨使左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依宋史卷254，列傳第13，頁8887，知其為僖宗光祿二

初正定附近佛寺的香爐造型早已在改變中，¹⁰⁶ 瓷器正敏感此變化。

相對的，唐金銀器則深受外來影響，¹⁰⁷ 在宋初，特別是香爐，則在三代化中。河北定州五號塔基出土的「銀製鍍金香爐」（圖9），¹⁰⁸ 圓腹，上有大型器蓋，下接三足。足上端與腹相接，飾有鼓出的獸首銜環，與同為五號塔基出土的「白釉帶蓋五足白磁香爐」（圖9-1）不同，後者則與唐代如法門寺等所使用的形制特點（圖9-2）較接近。¹⁰⁹ 是什麼力量與何等的贊助者促使改變？銀香爐銘刻太平興國二年（977），由邑主比丘尼智超等十一人及女弟子劉氏、妙香等十四人共同贊助，祈願此功德可以普霑諸有情，同歸解脫道，齊到濕盤城。似乎，三代銅器意象正漸漸滲入唐宋以來重要的金銀器，而由僧人、女性作為重要贊助者，並應用到當時儒家之外，盛行的佛家勢力的場域中。這種贊助者身分及場域的擴大，也帶來了呈現三代意象的質材種類的擴增，時尚中的貴重質材在教徒的高身分或力表對佛的虔誠敬意中得到贊助。香爐的造型則從唐代金銀器，透過如皇家對法門寺的贊助，採用外來的造型中，逐漸轉化到與三代較有關係的形制。

事實上，從五足香爐變化成三足鼎式爐，瓷器耀州窯址尤其明顯的呈現。陝西銅川耀縣黃堡鎮耀州窯址出土材料，顯示此變化趨勢正在北宋晚期到南宋之間。¹¹⁰ 更值得注意的是，五足爐（圖11上）上的紋飾與其它器制紋飾系統相通，多為耀州瓷通行的蓮花等，而鼎式爐上的紋飾則多屬「雷紋」、「蕉葉紋」、「鈎連雷紋」等與三代銅器相近者（圖11下）。顯然形制紋飾是來自新系統的引入，時間正是落在士大夫的集古、考古及徽宗的考古作山尊所帶動的追尋三代的風氣中。此外，耀州窯址出土內容包括佛教造像、飛天、羅漢、力士、供養人、僧人以及道教人物紋樣，如鶴馭仙遊人物等，¹¹¹ 「大觀」、「熙寧」、「政和」等皇帝

年，卒於宋太祖即位不久（886-960），任左都押衙的時間乃在晉六福五年至十二年間（940-947），推知時代在940-947年之間（樊瑞平、郭玲娣，前引文，前引書，頁43）。

¹⁰⁶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隋代墓243亦出土一白瓷香爐，形致亦與鼎近似，看來三代鼎制在隋代河南一帶並不陌生。石璋如編著，《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附錄一：隋唐墓葬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頁397，圖一二三。

¹⁰⁷ 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頁305-39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¹⁰⁸ 出光美術館編集，《地下宮殿の遺寶——中國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東京：出光美術館，1997），圖8；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頁39-51。

¹⁰⁹ 陝西法門寺考古隊，《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10期，頁1-26。有關唐代香爐的研究請參考冉萬里，《唐代金屬香爐研究》，《文博》，2000年2期，頁13-30；龜井德明，《隋唐・奈良期における香爐の研究》，《亞洲古陶瓷研究》（川崎：川崎專修大學亞洲古陶瓷學會，2004），1。

¹¹⁰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窯博物館，《宋代耀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603-605。

¹¹¹ 同註108，頁655-660。

年號字樣，也相間於紋飾中，似乎三代意象的香爐用在佛道場域中，促其普及化的可能推手，與擁有並熟悉三代銅器意象樣本的皇室相當有關。文獻紀錄也可輔證。天聖年間（1023-1031）宣賜行道者五百盒裝羅漢耀州青瓷香爐，而鑑山主為詩記此事，¹¹²明說耀州青瓷香爐透過皇帝的贊助賜給行道者以禮佛。皇室在三代意象進入皇室祭典中的不遺餘力，其進而將三代意象推展至耀州窯，使其走向民間佛道信仰中，促使外來佛教的香爐轉化成與三代有關的鼎式爐，正與佛家經典詮釋的逐漸中國化相平行。而三代意象在時尚的質材中，包括銀器及瓷器，得以隨著時尚得到更充沛的再生力量。

2. 民間信仰

這種以鼎式爐祭拜的現象在南宋已在民間文化中。四川廣元宋墓墓室東室東壁的浮雕圖像中，有一幅被稱為「焚香圖」（圖12）的，描繪著三足圓腹口沿有二立耳的「鼎」，報告者稱為「爐」。鼎的左邊有人對之作彎腰膜拜狀，報告者稱為「敬香人」。鼎的大小幾近人身之半，鼎右上角，則有一弧形蓋座的長方形的碑狀物，報告者稱為「神牌」，鼎下有長方形的似臺座之類的，但鼎的足不只沒有接觸到底下的長方座，且作傾斜狀，長方座上則陰刻細線紋，作短而波狀排列，報告者可能因此而解讀為「潮水」。¹¹³無論如何，人對著鼎彎腰頂禮是可以肯定的，至於最右邊坐在樹下的人與膜拜者及鼎之間的關係如何，帶蓋座的長方形碑狀物之間的關係，以及「潮水」的解釋等等，由於只有圖像，缺乏文字，且圖像並無意於更精確的空間關係以及物像描繪，為絕對判讀帶來一定的困難，而其代表著何樣的信仰？從圖像尚難以判定。此墓根據二方賣地卷，得知東室墓主為杜光世，男，年五十，葬於宋慶元元年（1195）。

但由於賣地卷文字草草，漫患不清，報告者也未作解讀，杜光世的社會身分目前尚難確定。唯從其石刻浮雕中有男、女、武士及四方四神等，富有地方民俗色彩，似乎以鼎為代表的意象在南宋十二世紀初正滲入各種信仰中，正從士大夫及皇室手中，步步走向民間，為四川一帶的一般人民所分享。

112 鑑山主以天聖宣賜行道者五百盒裝羅漢青瓷香爐為示復用韻「高林杲杲日欲出，卻視諸山雲自入，道人導我敞圓龕，五百金仙爭突兀，耀州燒瓷撲不朽，獅子座中蓮葉繞，亂餘得比鎮山靈，莫恨當時賜田少，世人變滅隨空雲，至人來往懸念跟，長眉下生會有辰，摩挲笑視默與論」，趙蕃（1143-1229），《淳熙稿》，影印文淵閣四庫本，1155冊；蔡汝芬，〈論「定州百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確性及十二世紀官方瓷器之諸問題〉，《故宮學術季刊》，15卷2期（1997年冬季），頁67。

113 四川省博物館、廣元縣文管所，〈四川廣元石刻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2年6期，頁53-61。

〔天竺靈籤〕進一步說明鼎在民間信仰中的普及化及新的詮釋，以及宋印刷術發明對三代銅器意象普及化的影響力。¹¹⁴ 八十六張籤中有八個籤圖繪了鼎的意象，並給予新的詮釋與脈絡。鼎往往被描繪在供桌上，香火裊裊，以勸慰求籤人遇到不順須向神祈福以避免災難。如第十九籤為「家道生荊棘，兒孫防虎威，春前祈福原，方得免分離」，鼎的香火成為向神祈福的行為與象徵（圖13）。更有在鼎的香火中寫上字以免災，如第二十八籤，要求卦人不可求速返舊除災，所謂「意速無船渡，波深必誤身，切須回舊路，方可見災屯」，籤上所圖繪的，在鼎的裊裊香火上寫一「願」字。另七十一籤，畫一折足傾斜的鼎，所謂「卦中塔未安相輪，主其事不圓備，鼎缺足乃不穩也」（圖14）。

事實上，鼎也不是唯一代表佛教徒向佛祈福的象徵。圓腹圈足近似簋，在南宋時也成為教徒祈福的象徵，在南方浙江出現。浙江寧波天封塔出土了一件銀香爐，自名「香爐」，卻是圓腹圈足，高僅8.2公分，口徑8.6公分的小香爐，器腹刻銘知由佛教女性弟子倪氏廿一娘，六十二歲在紹興十四年三月八日（1144）以香爐奉獻天封塔地宮，永遠用來供奉神明（圖15）。¹¹⁵

倪氏廿一娘跟著其它鄭十一娘子、徐氏二十娘子、李六娘、姜氏五娘等為同一地宮文物的佛教信眾的贊助者。¹¹⁶ 據研究，北宋已出現了婦女喜歡誦讀佛經等信釋氏現象，所謂「元豐（1078-1085）、元祐（1086-1093）間釋氏禪家盛，東南仕女紛造席下，往往空閨門」，¹¹⁷ 任尊聖妻呂氏，「晚好佛書，知緣果大略，怡然若有得。」¹¹⁸ 而江陰北宋孫四娘的墓中即隨葬有佛道經計十一卷之多。¹¹⁹ 婦女好佛的風氣不只在南方，北宋太平興國二年河北定州高達25.5公分的三足香爐，除比丘尼等男性十一人外，也有女弟子十四人共同贊助，顯然婦女且在經

114 〔天竺靈籤〕經羅振玉比對其收藏的洪武刊本等，將其定為嘉定間刊本，主要多從作風論述，並沒有確切的文字上的根據。羅振玉，〈天竺靈籤跋〉，《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頁301-306；周心慧亦從其說，《新編中國版畫史圖錄第一冊唐、宋、元版畫》（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頁34，本文以其版畫風格與廣元石刻近，似近宋代的民間作風。

115 《寧波文物集萃》（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圖103。

116 林士民，〈浙江寧波天封塔地宮發掘報告〉，《文物》，1991年6期，頁1-37。

117 鄒造，《道鄉集》（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162-163冊），卷37，頁16上；王安石的妹妹張奎妻「晚好佛書」（〔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99，頁620）。

118 （宋）陸佃，《呂陶集》，卷1615，頁496；陶晉生，〈士族婦女教育〉，《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頁161。

119 如《金剛波若波羅蜜經》、《佛說觀世音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及《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等，蘇州博物館、江陰縣文化館，〈江陰北宋「瑞昌縣君」孫子娘子墓〉，《文物》，1982年12期，頁28-36。

濟行為上奉獻佛教文物。相對於有宋一代當男性在儒家知識系統中，透過科舉取得仕進之途，而為三代銅器行其儒家論述時，女性則在篤信佛釋的信仰中，甚或成為佛寺的文物贊助者，把與三代銅器有關的三代意象帶入佛道世界中。

三代銅器意象不只在宋代儒家的再興中再生，也在釋、道與儒家的融合之中進入儒釋系統而再生。甚至往民間信仰的世界滲入，此趨勢在南宋似也初見端倪。南宋時期的信仰世界中，出現了一些由人變成神而由官方承認敕封的民間信仰神祇，其由人變神的歷程，往往配合神蹟、託夢人類為之興建寺廟。¹²⁰

媽祖信仰便經歷這種軌跡。南宋文人往往記載民衆為北宋女子林默娘（960-987）捐地建廟的聖蹟。南北宋之交的黃公度（1109-1156）¹²¹的「枯木肇靈」與稍晚紹興二十年（1150）進士廖鵬飛的〈聖墩祖廟重建 順濟廟記〉¹²²內容近似，二者皆以「枯槎」為媽祖建廟的象徵物。相對的，劉克莊（1178-1260）「風亭新建妃廟」則稱「元符初水漂一爐」。¹²³顯然「香爐」成為建廟的象徵物。清人更明確的把這兩種傳說分別稱為「枯槎顯聖」及「銅爐溯流」，並給予圖繪（圖16、17）。「三代銅器意象」，豈猶如清人所視覺化的，在三代意象更普及化的南宋流入民間信仰的媽祖傳統中？仍有待進一步資料考證。

（二）「窖藏」三代銅器意象

三代銅器意象不只出現在民間信仰中，更成為地方性的珍藏物，出現在依考古出土情境所分類的「窖藏」中，以別於有人骨共現的「墓葬」，且特別密集出現在四川，顯現其已深入使用在某些地方性的場域。考古報告多以四川窖藏乃避蒙元戰亂而來，但就窖藏的內涵分析其可能使用的脈絡而言，它們的性質甚複雜，除了學者所強調的道教之外，至少可分析出它們可能在儒、佛、道等交錯的應用場域中得到贊助、珍藏及發展。

120 韓森（Valerie Hansen），包委民譯，《變遷之神》（*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10-11。

121 「枯木肇靈滄海東，參差宮殿聳晴空，平生不厭混巫媼，已死猶能效國功。萬戶牲醪無水旱，四時歌舞走兒童；傳聞利澤至今在，千里桅檣一信風。」見（宋）黃公度，〈題順濟廟〉，《知稼翁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39冊），卷上。

122 其中的「元祐丙寅（1086）歲，墩上常有光氣夜現，鄉人莫知為何樣？有漁者就視，乃枯槎。…當夕遍夢墩旁之民曰：「我湄洲神女，其枯槎實所憑，宜館我於墩上。」（《白塘李氏族譜》，忠部，間接引自蔣維錕編校《媽祖文獻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頁1-3。）「我湄洲神女，其枯槎實所憑，宜館我於墩上」。

123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80冊），卷91，頁17。

1. 道教脈絡

就學者較充分討論的道教論，¹²⁴ 劍閣八處窖藏中，以縣城小東街器群提供了較堅實的證據。二件大型雙耳銅瓶，一小型瓶，三磁碗，及一印章。印章內容為「道經師寶」，所謂「佛以佛法僧為旨，道以道經師為義」，¹²⁵ 此印文證明這三件「瓶」很可能與「道經師」有關。¹²⁶

三件銅器約從50到10幾公分大小不等的「瓶」。從形制論，除最小的瓶與三代的觶近似外，大的二件，與其說與三代的壺近，倒不如說與當代流行的瓷瓶更近似。唯其獸首銜環等，則是三代壺的常見風格。二件大型器物明顯分成二部分完成的，與三代的一體成形不同。而其獸首銜環，也須特別鑄接，皆顯見宋代為成形此形制的不易與用心。小瓶紋飾，有圓形雷紋為底紋的獸面紋及夔龍紋；大瓶頸部有方形、圓形、多角形的雷紋，當中有醒目的圓渦紋，皆可能與三代的基本紋飾有淵源，唯經過宋人的選擇、組合及強調。這種選擇與強調，是有意的？抑或是當時的習慣？三件銅器是道經師的私人收藏？抑或是道觀的收藏？抑或是道教從三代銅器的形制紋飾意象中選取了部分，給以新的詮釋，而成為道教的禮儀用物？這些與三代意象有關者，皆值得日後進一步探索。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壺、瓶等器制，獸面紋、雲雷文等在南宋皆可能與道教信仰者有所交會。它們在劍閣這八大群的窖藏群中，被作成大型器，經用心的裝飾與成形，而明顯的與較薄小、往往沒有底部、較少紋飾的小銅瓶等有所區分。其中二群分別出土於白龍公社燈塔村及白龍村，往往與筷子，湯匙、燭等共出。這種明顯的努力強調與三代銅器意象關係甚深的器群，與這些紋飾製作皆簡的器群有什麼不同嗎？其皆屬道教系統？抑或與其他信仰或民俗有關？有待日後探索。唯類似的薄而少紋飾，有些無底的小銅瓶，在閬中，也與燭、匙、筷子等共出，且有一銅鶴，一似匱的薄銅器，及與三代關係較深的銅觚、瓷鼎等共出，¹²⁷ 其中一銅瓶也稍具紋飾，為

124 毋學勇在討論劍閣窖藏時，並從宋代排除道教而使道士們避居劍閣的山區的遺物，以為它們都是道教的祭祀器和煉丹器，唯實證證據薄弱，見毋學勇，〈劍閣宋代窖藏綜述〉，《四川文物》，1992年3期，頁15-19；謝明良收集宋代窖藏完整的資料，以具體的例證結合道家經典等，綜合闡述窖藏群中所呈現的道家特性，具啟發性，見謝明良，〈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區域與網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頁141-163。

125 〈司戎議〉，《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1983-88），頁287-1。

126 劍閣器群在《四川文物》中發有簡報，但八次器群只作綜述而沒有分別報告，感謝國科會贊助，得到四川當地目驗並查證該文管所的報告，也感謝該所及成都考古研究所王毅所長的幫忙，及張維珊幫忙拍攝電腦檔案照片。

127 張啓明，〈四川閬中縣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7期，頁85-90。

圓渦紋與圓形的雷紋底，這類的紋飾母題及作風與劍閣器群的大瓶有近似之處。是否說明它們的分野僅在於精粗或大小，但皆行之於道教用物中？或僅僅是品質或身份的不同象徵而已？皆有待更進一步研究。

2. 儒家脈絡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以四川爲主的窖藏，似非道家脈絡可以完全解釋的。江油窖藏（圖20），¹²⁸ 雖與劍閣小東街窖藏同樣出有印章，且有五方（圖18），但所說明的特質似所不同。五方中，除一方難以釋讀外，其它四方印文如「讀書得新功，來雁寄寸字」、「進德修業」等則與儒家提倡的價值觀近似。另一「天迎雲（？）」框在「鼎」的造型中，雖不知其涵義，但印章格式特別，流行的時間與三代論述極發達的宋代相平行，而宋文人間似乎也發展出以三代意象爲形的印章，¹²⁹ 如劉叔剛的「桂軒印」（圖19）及「叔剛印」。此外，又有大型的「延陵郡記」（圖18），屬九疊篆風格，據研究在宋代主要作爲中高級職官的印信。¹³⁰ 至於「延陵」一地，據《宋史》地理志，屬兩浙路的丹陽「熙寧五年（1072）省延陵縣爲鎮入焉」。¹³¹ 若「延陵郡記」爲窖藏主人的印記，此主人除四川劍閣以外，可能是與「延陵」有地緣關係者，甚至不無可能是劍閣的外地人。四方印似乎透露出窖中藏物與儒家仕途脈絡的相關性。同窖中出有象棋、墨硯、烏龜等，在日用百科全書《事林廣記》中，即收錄有〈碁局篇〉，反映出南宋末元初時人的休閒弈碁。¹³² 其間共出的燭臺、銅匙等，甚至硯、墨、筆等皆出現在司馬光的《書儀》¹³³ 及朱熹的《家禮》¹³⁴ 中的家庭儀式用物，《書儀》及《家禮》二書乃出於對三代之禮不可變者而作損益，酌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而成的宋人當世之庶民的日用禮書。湖南常清黃土山黃石墓爲一仕宦人家，並有石硯、銅器隨葬¹³⁵（圖4），或許是當時仕宦讀書人喜好的象徵物吧？

128 江油縣文物保護管理所（黃石林），〈四川江油縣發現宋代窖藏〉，《考古與文物》，1984年6期，頁52-55。

129 蕭高洪，〈試論隋唐宋（遼夏金）時期印章藝術風格的形成與發展〉，《隋唐宋印風（附遼夏金）》（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頁15-16；南宋劉叔剛曾刻印十三經注疏中的《禮記注疏》，應是出版家。

130 蕭高洪，前引文，前引書，頁13。

131 《宋史》地理志卷88，志第41，頁2175。

132 陳元靚，《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8，至元六年，鄭氏積誠堂刻本），庚集卷上，頁175，戊集卷10，頁72。

133 司馬光，《書儀》，卷3，頁6-8；卷10，頁4。

134 朱熹，《家禮》，卷4，頁16；卷1，頁4-5。

135 常清市博物館，〈常清黃土山宋墓〉，《湖南考古》，2002年下，頁441。

如此看來，此窖藏的主人，或許是儒家仕宦之途中的地方士紳或富貴人家，特別是三件鼎及一件爵（圖20）等富三代銅器意象，不無可能是在儒生的生活品味脈絡中受到珍藏，其爵及鼎的形制、紋飾等的獸足裝飾，顯然是有所典據的，與《事林廣記》¹³⁶所圖繪的（圖21）雖不盡相同，但形制近似。

3. 佛教脈絡的推測

此外，彭州出土一群以銅器為主的窖藏，¹³⁷器類與紋飾多樣，且大型器多，顯示器類、形制、紋飾等盡力模仿三代銅器意象的意圖強烈，是罕見於其它四川窖藏器群的特色。除了如劍閣的小瓶外，就形制說，有極複雜的甗、三足壺、鬲、鼎等三足器制，高大達50公分左右的甗以及壺等，分二層鑄成。紋飾方面，如乳丁紋、各種雷紋及獸面紋等，與劍閣縣城小東街的大型器作風及母題皆有近似處，且更多樣，如大型的夔龍紋、夔紋、蕉葉紋等。這種對三代銅器意象的推崇及努力找尋技術仿製，是來自何等的贊助者呢？據館長說，出土時，銅容器中裝有二尊佛像。假若屬實，這些三代銅器意象是用在禮佛場域中嗎？禮佛需要如此不同的各類器制嗎？窖藏主人是否來自寺院？這些是寺院的收藏嗎？抑或也是地方士紳作為三代品味的仿器收藏者嗎？在銅料來源不易獲得，¹³⁸大型銅器在宋代已非時尚下，其對三代銅器意象的典據及奮力以高難度技術仿製，何以在四川彭州出現，雖因資料不足無法完全理解，但在三代銅器意象的再生上，值得特別注意。

4. 地方士紳珍藏

必須注意的是，前述四川窖藏器群中，往往顯示同窖中銅器基本上與三代意象關係較深，瓷器則多反映宋代時尚。就這點論，遂寧金魚村的窖藏就相當特別。除了銅觚、銅簋之外，窖藏的龍泉青瓷且仿製了雙耳獸首簋、鬲、獸首銜環鼎、獸首銜環獸首鼎、貫耳壺等，與三代銅器有關的器制。¹³⁹這種品質極精緻的仿古青瓷，不只是南宋皇室的專利，在四川一帶，也為四川士紳所贊助、所珍藏，以區別於一般民衆。這種來自地方窖藏的985件瓷器，瓷鼎類型已甚多樣，

136 元至順（1330-1333）建安椿莊書院本收錄的後集，卷11，頁1-5；卷10，頁10。

137 該器群尚未發表，感謝國科會、成都考古所王毅所長及彭州博物館館長之助，得以目驗。

138 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0期（2001年3月），頁59，註104。

139 遂寧市博物館（莊文彬），〈四川遂寧金魚村對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4期，頁4-28；李偉綱、何瀛中，〈宋瓷精華——金魚村窖藏〉（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1）。

在以瓷質捕捉三代銅器的形制特質上，顯出強烈的興趣及用心，為瓷器製作引入新方法。

除簡單的三足與器腹在器底黏合的較簡單的製作方法¹⁴⁰外，小如7.1公分的鼎制，為模仿銅器獸足特色，而有必先模壓器足再與器腹貼合；¹⁴¹有以堆塑方法使足部獸首更突顯者（圖22）。¹⁴²同時，紋飾方面，更引進瓷器的時尚紋飾，刻花蓮荷紋，以剝削的方式浮雕表出，使三代的器制在與時尚紋飾結合中得以再生。

值得注意的是八卦紋在瓷鼎上出現（圖23），重慶榮昌窖藏出土的鼎，且以高浮雕突顯八卦圖像（圖24），¹⁴³這是罕見於三代銅鼎等銅容器的紋飾題材。但《宣和博古圖》的鼎總說，開章明義即直接將周易六十四卦與鼎相連給予詮釋，所謂「周易六十四卦，莫不有象，而獨於鼎言象者，聖人蓋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謂之象，……以適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¹⁴⁴這種六十四卦圖像，在四川發掘的宋代窖藏中，往往也見於八卦鏡，且有銘文，說明宋人對「八卦鏡」圖像的解讀，所謂「水銀集陰精，白煉后得鏡，八卦開象備，衛神成永命」，¹⁴⁵宋代學術研究重視易學，在蜀學中舉足輕重，¹⁴⁶宋人是否以八卦紋樣對鼎作重新詮釋，以向神明祈福？這種宋人的三代新意象正見於四川一地，為人所珍藏。

此外，宋人也以龍泉青瓷仿三代銅鬲。¹⁴⁷類似的龍泉瓷鬲以及其他三代銅器意象、八卦圖像也見於韓國新安海底沉船（圖25）中，¹⁴⁸八卦紋鼎意象甚至

140 《宋瓷精華——金魚村窖藏》，頁40，圖7，2189。

141 同上註，圖8，2246。

142 李偉綱、趙川等，〈金魚村宋瓷窖藏的價值〉，李偉綱、何瀛中，前引書，頁11。

143 重慶市博物館，〈重慶市榮昌縣宋代窖藏瓷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407-414。

144 《重修宣和博古圖》，卷1，頁3。

145 黃石林，〈江西發現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7年2月，頁63-65；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范桂杰、胡昌鈺），〈四川德陽縣發現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7期，頁83-89；大邑縣文化館，〈四川大邑縣安仁鎮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7期，頁91-94。

146 胡昭儀、劉復生、粟品孝，《宋代蜀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7），頁211-246。

147 五件中，出版目錄排出從16.4到12到10公分大小不等的三件形制類似的鬲，這種平口，且有棱脊的龍泉青瓷鬲，所仿製的正是西周中晚期的銅鬲形制特點。河南陝縣上村嶺出土形制相當的大小相序的銅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下冊，彩版四：1，M2001），宋人是否對三代有此認知，不得而知（《宣和博古圖》未論及此，但歐陽修的《集古錄》及呂大臨的《考古圖》皆有論及簋的成對偶數的問題）。

148 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編，《新安海底遺物》（漢城：同和出版社，1981），資料篇I，頁18，圖

隨漢人移民漂流過海，在臺灣清代道光年間的淡水廟宇的香爐中（圖26），保存在民間信仰的脈絡中，¹⁴⁹顯然八卦紋鼎等有著長遠的流傳與地理的位移。這些三代銅器意象在韓國、在日本是在何樣的脈絡中被使用，有待進一步研究。¹⁵⁰

值得一提的是遂寧窖藏，985件瓷器佔有98%，其中龍泉瓷有342件，還有少數當地的廣元窯。唯帶有三代銅器意象的瓷器，多為外地進口的景德鎮瓷及龍泉瓷，如此豐厚的財力及運輸，其中，並沒有佛像及通見的廟宇用物，也不是出自地宮，看來作為地方士紳珍藏的可能性甚大。

三代銅器意象在宋地方士紳的贊助下，使用在貴重、風行、且已商品化的銀製品中，¹⁵¹使宋代金銀器有別於唐代，使得唐代的外來因素成分弱化，某種程度的為三代銅器意象所取代。

就形制說，宋代金銀器主要引入了鼎、簋及瓶等器制，皆非唐代金銀器所興趣的。¹⁵²從宋人論述中將鼎與易卦相繫，與官位互連，可顯示宋在三代意象的再

版6、6.7。至於龍泉瓷甬室宋代古物保存到元代，是運往韓國，抑或日本，學界多所討論，出川朗哲、穆向前摘譯，〈遂寧窖藏出土龍泉窯青瓷與新安二沉船及日本傳世品之比較〉，《宋瓷精華》，頁24-25。

149 李乾朗，〈鄞山寺調查研究〉（臺北：臺北縣政府、行政院文建會，1988）。

150 謝明良，〈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期（2004年9月），頁161-190。

151 銀器在北宋汴京用途廣泛，上自皇帝賜臣下，下到街頭巷弄酒店雅壺到民間習俗如育子送禮等，（宋）孟元老，〈東京尋華錄〉，卷2，〈宣德樓前省府官宇〉在汴京景靈東官南門大街以東南，有唐家金銀鋪……酒店上戶銀罐酒七十二文一兩……。在〈東南樓街巷〉有金銀絲帛交易之所屬；卷4的〈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亦有金銀鋪；〈會仙酒樓〉「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斤，水菜碗三五隻，及銀近百兩點。雖一人獨飲，盃遂亦用銀盃之類……」。卷5的〈民俗〉「……其正酒店戶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育子〉「父母家以銀盆……」；卷6的〈元旦朝會〉「賜闈裝銀鞍馬衣著金銀器物……」，〈立春〉「宰執親王百官皆賜金銀……」，卷7的〈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執一竿上掛以錦絲銀盃之類」；〈駕幸射殿射弓〉「一人口銜一銀盃」，卷8，〈是月巷陌雜賣〉「悉用銀器」；卷9的〈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勝者，則以銀盃」，「御席酒盃，……廊下純銀食器」；卷10〈十二月〉「……僧尼三五人作隊念佛，以銀銅沙羅……」。〈宋〉周密，〈武林舊事〉，在宗室南渡後，臨安金銀器的使用仍普遍，如皇帝賜大臣的禮物、公主下嫁的嫁妝、見舅姑的禮物，卷2〈燕射〉「賜宰臣以下十兩銀碗各一隻」；〈公主下降〉「銀器百兩，……聘財銀一萬兩，對御賜筵五盃……謁見舅姑，……銀器三百兩……」；卷3〈歲除〉「……金銀器皿」，卷6〈歌館〉「凡酒器、沙罐、冰盆……悉以金銀為之」，〈游手〉「……以偽易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可見在南宋人的金屬價值體系中，金銀是高於銅鉛的）；卷7〈德壽宮起居注〉記淳熙三年（1176）皇上進香……「金銀器皿」；卷8〈宮中誕育儀禮略〉大銀盆，〈皇后散付本府親屬宅眷幹辦使臣以下〉「銀盤盃共二千兩」；卷6〈酒樓〉「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

152 陝西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大學震旦古文明研究中心編著，〈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齊東方對唐代金銀器的主題紋樣、形制及其與外來文明的關係多所研究，〈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韓偉對法門寺尤多闡發，〈磨硯書稿——韓偉考古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四川綿陽其中有「崇寧

生上舉足輕重，因此銅、瓷、銀器皆有興趣仿造。就金銀器而言，以小件為主。泰寧鼎（圖27）¹⁵³ 僅9.3公分，綿陽鼎為13.8公分，耳及足似乎是經模造再焊接的。泰寧的鼎且特別被指出「分內膽，外層兩部分」，顯然，即是宋代為追求三代銅容器的「渾厚凝重」感，在質材移植中，以時尚的銀所形成的特有的「夾層合成法」。¹⁵⁴ 這類小型的鼎，如附耳，除了作為三代符碼的重要代表外，事實上，似乎已沒有三代鼎耳可以穿鉉以提舉的作用，它們是否能如瓷鼎般地作為焚香香爐用，或作為宋人對鼎的象徵意涵的重要代表，皆有待進一步研究。

彭州窖藏出土的九套銀執壺與溫碗，更說明三代銅器意象如何進駐在銀器工藝發展中，與佛教意象一齊風行，也使得三代器制及紋飾為宋人沿用，並給以新詮釋，以進入時尚脈絡中。三代的雙耳銅簋，主要作為棗盛器的飯碗，在四川彭州窖藏中，功能上則被用來與執壺搭配成套，報告者稱為「溫碗」。據言出土時即有執壺置於溫碗之內（圖28）。該窖藏出土的類似組合高達九套，¹⁵⁵ 多圓腹圈足。其中兩套「溫碗」有雙耳，但一套雙耳已殘斷。¹⁵⁶

九套中有四套因採用三代銅器意象中的某些因素而與其它五套有所區隔。五套溫碗中，口沿與足器作曲線形的所謂葵口特色。相對的，其它四套則器與足皆平口，與三代的「彝」近似。這種圓腹圈足如碗、杯等，亦見於白沙二號宋墓墓室西南壁壁畫中（圖29）。¹⁵⁷ 值得注意的是，三代銅器的紋飾也進駐到此四套中的三套，不只與同件器中的時尚紋飾共存，並因為三代紋飾的引入而滿裝，而與其它五套的少紋飾或以時尚為主的現象有所區隔（圖30、31）。如「雲雷紋」的見於執壺及彝的口沿及圈足，考古報告稱為「蕉葉蟬紋」、「三角形紋」，¹⁵⁸ 但

通寶」錢幣，除風格比對外，成為宋代窖藏的積極證據，綿陽市博物館（胥澤蓉），〈綿陽市出土宋代窖藏銀器、錢幣〉，《四川考古報告集》，頁308-405，及福建泰寧從風格比對，此批窖藏時代被斷為南宋至元初，李建軍，〈福建泰寧窖藏銀器〉，《文物》，2000年7期，頁65-70。

153 李建軍，〈福建泰寧窖藏銀器〉，《文物》，2000年7期，頁66，圖7。

154 肖夢龍，〈試談宋代金銀器的造型和裝飾藝術〉，《文物》，1986年5期，頁81-8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館編著，謝濤，〈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247。

155 謝濤，〈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頁94。

156 謝濤，〈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頁116。《重修宣和博古圖》亦歸納出其所註解的三代銅器有「瓶與壺」、「尊與壺」、「彝與舟」的「其類相須之器」（《重修宣和博古圖》，卷8，頁4），這九套銀器或許正與宋人理解的三代的「相須之器」概念吻合，而在「彝」與「執壺」的成套使用中，部分帶入了三代銅器意象，而與時尚因素共存。

157 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1951），圖版玖，頁101，該墓推定年代為徽宗時代。

158 同註153，頁111-119。

若引用宋人名物習慣，如《重修宣和博古圖》則將向上者稱為「山紋」、「蟬紋」，¹⁵⁹ 向下者稱為「垂花紋中著以蟬紋」。¹⁶⁰ 宋人從眾多三代紋飾中選用這些紋飾以裝飾貴重的銀器，是否有其特殊意涵呢？值得注意的是在《重修宣和博古圖》中，宋人是給予這些紋飾新的詮釋的。如「雷取其奮豫，雲取其須澤」，¹⁶¹ 「山紋以取其仁之靜」，¹⁶² 「蟬以取其趨高潔而不沉於卑穢，清高而不貪」，¹⁶³ 故「取清高而不貪，則著之以蟬紋；欲時動而澤物，則文之以雲雷」。¹⁶⁴ 《重修宣和博古圖》對三代紋飾意涵的當代詮釋，或許僅代表北宋末官方的理解，但作為官方欽定本，其代表性及影響力不容忽視，對民間富貴人家的珍寶而言，引入與三代銅器有關紋飾，當是有意選樣或訂製的結果，並因重視其中宋人所給予的修德養性意涵，也不無可能。這類新的詮釋，可能使得已死亡的三代紋飾得以在貴重的銀器中再生，也同時消滅了唐以來銀器藝術中外來因素及時尚因素的比例，而共存於宋代。值得注意的是，其上的刻款，除習見的可能是藝匠名稱，如「羅祖一郎」或可能是作坊名的「王家十分」等外，這三套又有壓銘，包括「官」字者，如「口司官口口」，見於CPJ226執壺；「歷回官」之見於CPJ175溫碗（圖30），三代銅器意象，是否來自官府工坊而見於彭州的窖藏？¹⁶⁵ 只從簡單的含有「官」字而其它又難以釋讀的情況下，是地方型官府或中央官府仍難判定。根據《武林舊事》¹⁶⁶ 所記地方及中央皆有官方作坊，皇上每每以銀器作為賞賜臣下的禮物看，帶有三代銅器意象的銀器是否是來自官方的禮物，而使三件滿裝紋飾在精細中顯出與其它區分開來的官樣風格特質？或者它們是與地方官府有關的窖藏？皆有待進一步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三代銅器意象在宋代，進入了外來文化影響極深的銀器工藝的技術、造型與紋飾題材中，與當時帶有佛教題材蓮花、忍冬及日常生活題材並存，可能因為它被涵蓋在時潮中，成為區分於一般時潮的官樣，以突顯其身分

159 《重修宣和博古圖》，卷15，頁12；48；卷16，頁10；卷5，頁12。

160 《重修宣和博古圖》，卷3，頁15-16。

161 《重修宣和博古圖》，卷6，頁32。

162 《重修宣和博古圖》，卷5，頁10。

163 《重修宣和博古圖》，卷5，頁12；卷16，頁10。

164 《重修宣和博古圖》，卷16，頁10。

165 謝濤，以為是地方官作坊，〈宋代金銀器概況〉，《四川彭州金銀器窖藏》。

166 同註144。

167 薛堯，〈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年11期，頁571-572。

性，流傳在地方，成為地方窖藏的珍寶。

（三）「殉埋」三代銅器意象

雖然司馬溫公的「書儀」及朱熹的「家禮」為庶民所建立祖先祭祖儀式，並未強調以古代意象作為祭器的必要性，但三代銅器意象已在宋代為江南一帶的士宦或富庶人家用在時潮中，陪伴著祖先的來生，使得三代銅器意象特別是鬲、鼎等以各種質材成形，更深入民間的祖先信仰中，為元明以來墓葬中五供祭器形式預現端倪。

北宋時，江南如江西等偶見如908年用鐵鼎陪葬78歲的陳氏六娘、¹⁶⁷及宋金公吳氏¹⁶⁸等，這種習慣亦見於南宋江南，如淳熙五年（1178）隨葬孫大郎等，¹⁶⁹嘉定元年（1208）則用另一種質材錫鼎以隨葬隨宋室南遷定居諸暨的董岡嗣夫人周氏。¹⁷⁰晚於建炎三年，在湖南常清黃土山，更有石鼎，飾以八卦圖像及火鋸紋（圖32），以隨葬邢少卿。其被放在夫妻合葬墓中夫的墓室，伴隨時尚的瓷碗。¹⁷¹南京龍潭更出現了以影青小瓷鼎隨葬者；¹⁷²在浙江磐安M1也出現了青瓷鼎，時間稍早於嘉定癸未（1223）左右。¹⁷³南宋時鬲式瓷爐在江南也往往用在隨葬，如江西臨江¹⁷⁴及浙江德清。¹⁷⁵

五、從考古到玩古

（一）古物市場的活躍

北宋士大夫的「考古」、皇室的「仿古」、古物新價值觀的散佈、擁有古銅器的知識與實物在政治社會上所顯示的身分性、關於古物的書籍的傳抄或印刷、以及由北宋到南宋的三代銅器意象在窖藏墓葬以及儒佛道等場域的應用等等，皆反

168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等，〈江西鉛山縣蓮花山宋墓〉，《文物》，1984年11期，頁986-989。

169 孫定榮，〈江西金溪宋孫大郎墓〉，《文物》，1990年9期，頁14-18。

170 方志良，〈浙江諸暨南宋董康嗣夫婦墓〉，《文物》，1988年11期，頁48-54。

171 常清市博物館（徐小林），〈常清黃土山宋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學會合編，《湖南考古》（長沙：岳麓書社，2002）下，頁434-446。

172 金琦，〈南京市郊區龍潭宋墓〉，《考古》，1963年7期，頁344。

173 趙一新，〈浙江磐安縣安文宋墓〉，《文物》，1987年7期，頁72-73。

174 黃頤壽，〈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年7期，頁672。

175 袁華，〈浙江德清出土南宋紀年墓文物〉，《南方文物》，1992年2期，頁25-26。

映擁有真正古物的重要性，以及隨之而來與三代意象有關的銅、銀、瓷器等的市場需求等。距今已遠的古物樣本的有限性，背後是必須「購」自耕夫牧兒等，且價值不可能低。因此歐陽修面對士大夫這股好古物的新風氣，曾以史家眼光，歸納出二條件，即「好」與「力」。李公麟以「千金不惜」取得古物而成爲收藏家；李清照說明趙明誠當太學生時，質衣半千錢至相國寺買古物中較低廉的碑文，¹⁷⁶更有官吏以黃金百兩從趙明誠家買古器者。¹⁷⁷皇室更以「一器值千金」取得古物，以成就皇室收藏。¹⁷⁸《東京夢華錄》、《夢樸錄》描繪南北宋京城繁華，皆記錄了相關古董店舖的活絡及位置，¹⁷⁹南北宋之間古物樞場的買賣及樞場中的買賣中介的人與事，在文獻中也留下痕跡。¹⁸⁰與市場需求相平行的是宋代的盜墓情形亦常見，¹⁸¹連皇陵亦經盜掘，¹⁸²近日發掘的皇陵、皇后陵等出土時，大多數隨葬品已經被盜掘，¹⁸³皆顯示市場對古物需求的殷切、古物消費及其意象的普及化，皆反映宋代經濟的繁榮，南宋的江南尤其成爲古物意象的大消費場域，一種新的古物價值觀則與這些現象互爲因果，在南宋的仕宦邊緣人中孕育成形。

(二) 從廟堂到「明窗淨几」——「塵外之客」的新價值觀

三代銅器意象從北宋初期的廟堂到南宋漸普及化，應用到儒、佛、道場域，

176 (宋) 趙明誠，前引書，後序。

177 「和安大夫開卅團練使致仕，王繼充先嘗以黃金三百兩從故密閣修撰趙明誠家書古器。」(宋)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325冊)，卷27。

178 (宋) 葉夢德，《避暑錄話》，卷下。

179 〈相國寺萬姓交易〉，「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書……」，見《東京夢華錄》，卷3。

180 「又嘗見縉紳之士，競欲取媚于權門之子，悉與市塵易古器，鬻畫圖，得一珍寶古玩，即盛價而求售，爭妍而乞憐，儻合其意，美官要職，指日可得，儒衣儒冠而爲侯門之償賣，恬不以爲恥」，《三朝北盟會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記事本末類)，卷159，頁1154-1，此乃朱夢說上書宋徽宗之言。關於買賣事參考葉國良，〈附帶常賣(買)考〉，《宋代金石學研究》，頁31-35，1982，博士論文。

181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於上。而好事者須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竿縉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塚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藏，一但皆見，不可勝數矣。」見(宋) 葉夢德，《避暑錄話》卷下。

182 (宋) 周密，〈楊髯發陵〉，《癸辛雜識》所證乃元代盜宋陵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40冊)，續集卷上。

18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宋皇陵》(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9)；河南文物研究所、鞏縣文物保管所，〈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88年3月，頁19-46。有關宋代的盜墓情形，可參王子今，《中國盜墓史，一種社會現象的文化考察》(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頁157-171。

從墓葬、古物市場到明窗淨几，正預示了南宋古物新價值觀的成熟。北宋早期以來士大夫以再現三代、力求避開被視為「玩」古物的心態，到南宋時期終於由仕宦邊緣人孕育出對三代銅器的新觀念，這種三代關懷漸薄、古為今用漸濃的玩古心態，使得三代銅器意象再經轉化，得以進駐宋人的現世閒居生活中。趙希鵠《洞天清錄》及張世南《遊宦紀聞》是為代表。

宋初如呂大臨所查訪的士大夫收藏家及牽連的愛好群，基本上多在仕宦之途上，往往有事功見於《宋史》，無形中形成了共通的儒生對三代銅器意象的看待模式。相對的，張世南，鄱陽人，¹⁸⁴ 在其遊宦紀聞序中自謂「隨侍宦遊，便登萬里之蜀」，到壯年「走江湖，無寧歲」，故書名為「遊宦紀聞」，其中有關三代銅器的論述，便放在當代掌故、逸聞、風俗方物、醫藥、園藝、曆法等生活紀聞中。其為寧宗理宗（1195-1264）間人，¹⁸⁵ 雖自稱「仕閩中」，¹⁸⁶ 「游蜀道，徧歷四路，數十郡，周旋凡二十餘年」，長於考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只好稱「不知何官」。¹⁸⁷ 並指出該書「無一語及時政」。檢視其歷練、其對古銅器的關注點與宋初士大夫不同，本文姑且稱為「仕宦邊緣人」。至於趙希鵠的身分，資料更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宋史》¹⁸⁸ 世系燕王德昭房下，而以為是趙宋宗室子。唯查證燕王德昭房下有希字輩者，並無一名「希鵠」者。可能或是宗室之子，或是宗室之子中之邊緣人，因此，在正史紀錄中才有此況。

《洞天清錄》序述作書原委，自謂是人生苦短閒居自找樂地之清錄，以貽「清修好古塵外之客」，他是仕宦邊緣人的可能性不小。《洞天清錄》原序，清楚的把古銅器放在其人生體驗出的休閒的重要性的框架中，說明在「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分之二，其間得閒者，才三分之一耳。」因此，重視閒居的生活品味，強調「摩娑鐘鼎，親見商周」，明窗淨几，羅列古物，將在聲色之外，為閒居所受用，清修好古，將使塵外之客，自有樂地。在人與古銅器互動中，古物的視覺形象所呈現的感官世界，成為關注的重心，也正是「洞天」所清錄的。在這世界中，古銅瓶鉢可以當作花瓶，養花果，並對真正古銅器所具

184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4冊），卷11，頁525。

185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遊宦紀聞》，從其書中紀年有「嘉定甲戌」（1214）「紹定癸巳」（1233）而推測。

186 《遊宦紀聞》卷10。

187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遊宦紀聞》。

188 《宋史》，卷215。

備的時間感給予美化、神奇化。唯有真古物可以使花色鮮明、開速而謝遲。¹⁸⁹ 唯有真古物才能避崇，而有〈古銅器靈異〉條。因此辨真偽的知識成為主要的關注點，認清市面上由於真古器需求殷切所帶來的仿古與偽作，而有所謂〈款識真偽〉，及〈水土傳世三等古銅器〉條。對銅器銹色的細微差異，對入土千年的「時光自然銹色」作仔細觀察與辨識，以確認千年時光在古物上的特點，以別於偽作。值得注意的是，宋初士大夫甚少關心的鑄造問題，在此脈絡中卻引起注意，而有〈臘模〉一條。唯知識性的關注多為辨偽而來。「辨偽」成為重要問題，¹⁹⁰ 三代銅器意象在普及化中，以及關注點的移轉中，似乎離開理解三代的宋初所標示的目標漸行漸遠。

比《洞天清錄》稍早，王世南《遊宦紀聞》早已轉到此關注面，歸納古器之「名」及如何辨識古物等，趙希鵠則將這一套知識放在人生閒居生活品味中，以別於一般的聲色追逐，為三代銅器意象的再生及生活化，開拓更廣大的群眾基礎。《梅花喜神譜》的以「卣」、「簋」、「爵」、「鼎」等三代銅器的詞彙及形制特徵，說明梅花姿態（圖33），¹⁹¹ 更有以「鼎」等形制作成印章的邊框造型，以及文人士大夫把鼎成為生活中的「香爐」，¹⁹² 皆是這種把「古」生活化的進一步的應用，為元明，特別是明代的發展，預示了方向。¹⁹³

六、餘 論

與市場需求、新價值觀相表裡的是有關三代銅器意象圖書的流傳，不只包括

189 〈古銅瓶鉢養花果〉「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器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鏽，傳世古則鬲，陶器入土千年亦然。」（宋）趙希鵠，《洞天清錄》，頁25。

190 在南宋可能偽器已甚氾濫，因此《洞天清錄》所建立起來的這類認知知識，從今日的認識看來，似乎是建立在偽器或仿品的基礎上。

191 （宋）宋伯仁，《梅花喜神譜》，卷上，〔大葉八枝〕、〔欲開八枝〕、〔大開一十四枝〕，《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4），第一輯，頁59、71、54、51。

192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焚香，時人謂之梅香。（宋）陳敬，《喜香》，《陳氏香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44冊），卷4，該書同卷又有焚香辟瘟，燒香引鼠之說。

193 《洞天清錄》在明嘉靖年間，且被收錄在「悉囊廣要」中，猶如今的口袋書，發行者序云「大不盈掌，於遠遊行李甚便」，但「以之而居家，則家可理，以之而游藝，則藝可精，以之而衛生，則養老安幼」（《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82冊，「壽養叢書」、「悉囊廣要」、「艷雪齋叢書」、「士商必要」）據明童氏樂志堂刻本影印原書版，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可見其流行，有關三代古物的論述及生活化，在有明一代繼續蓬勃發展如曹昭的《格古要論》、高濂的《遵生八牋》、陳繼儒《妮古錄》、文震亨的《長物志》等，與《洞天清錄》的態度及思想有所關聯（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的第一章論及明代有關物的著作中，也提及此關聯，頁10-11,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來自士大夫的《三禮圖》及《考古圖》，來自皇室的《重修宣和博古圖》等，三代銅器意象且被收錄在宋末元初的百科全書中，陳元靚《事林廣記》是為代表。陳元靚據考證為福建寧安人，並「無功名仕歷，惟隱居而已」，應該也屬仕宦邊緣者流，著作多取便流俗通用者。¹⁹⁴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現存最古的版本為元至順刊本（1330-1333），最晚為明嘉靖二十年（1541）刊本，刊行前後超過二百年。¹⁹⁵很有意思的是，現存最早的元至順（1330-1333）間建安椿莊書院本原名為「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與鄭氏積誠堂刻本相比，特別是椿莊書院刊本「器用類」圖繪的器制特多，包括有實物作摹本繪製《宣和博古圖》系統者，以及臆測的《三禮圖》系統（圖21）。¹⁹⁶相對的，鄭氏積誠堂刻本則以《三禮圖》系統的圖繪為主，而列入「祭器儀式門」。¹⁹⁷椿莊書院刊本在目錄之後有椿莊書院的謹咨，謂「是編增新補舊，視它本特加詳焉。」¹⁹⁸或許，來自《宣和博古圖》有實物作標本的圖繪系統者為椿莊書院所增加。宋版確實如何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刊刻長達二百年的各種版本已透過百科全書的圖繪形態在民間流傳。值得注意的是更出現在朝鮮李朝實錄的禮儀圖繪中（圖3-3），其綜合了朱熹的《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的孔廟祭典系統及《事林廣記》的民間百科全書，影響朝鮮的瓷器（圖3-2）製造。

事實上，隨著唐宋時代印刷術的發達，佛道的流行以及儒學的佔有科舉主要科目等經義普及的需求，特別是南宋纂圖佛經及纂圖儒家經典也隨之風行，雖然三代銅器在戰爭中流散，但以其意象為主的圖繪卻被保留在書籍中，今日仍流傳其圖繪之書。¹⁹⁹不只《三禮圖》被圖繪在國子監，《新定三禮圖》的宋淳熙二年（1175）刊本，²⁰⁰宋代陳祥道的《禮書》，據元至正七年（1347）福州錄儒學刻明修本，²⁰¹林希逸的《虞齋考工記解》²⁰²（圖34）等等的圖繪皆屬《三禮圖》的系統。宋刻本的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釋文的《纂圖互注周禮》（圖35）則綜合

194 胡道靜，〈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前言〉，（宋）陳元靚，《事林廣記》（影印元後至元六年鄭氏積誠堂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附錄，頁559。

195 森田憲司，〈關於在日本的《事林廣記》諸本〉，《事林廣記》，附錄，頁566。

196 《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椿莊書院刊本，卷11，頁1-5；卷10，頁10。

197 〈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 戊集卷一〉，《事林廣記》（鄭氏積誠堂刻本），頁365。

198 《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前集，目錄，頁76。

199 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1-110；周心慧，《新編中國版畫史圖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第一冊，頁28-44。

200 鄭振鐸，《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01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經部三。

202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南宋後期刊，元延祐四年（1317）修補本。

《三禮圖》及徽宗時的依收藏真蹟而圖繪禮局樣並列。可以肯定的在有宋一代，三代銅器意象正以《三禮圖》及《宣和博古圖》二大系統，隨著當時的纂圖儒家經典流行。

而錄列實物收藏的皇家《重修宣和博古圖》及《考古圖》分別在南宋及元明也一再再版翻刻，大半皆須再請圖繪藝匠依所根據的版本重繪，有些更經縮版。由於圖繪不是對著原物，而是平面圖繪，歷經翻刻改版，三代真正的銅器意象在激增的需求中，從皇家圖書到日用百科全書，愈普及，離真實愈行愈遠的機率也愈大，有些往往祇留下幾點基本特徵而已。

宋人在佛、道盛行中，在重新肯定儒家而祖述三代中，使得三代銅器意象再生，也影響了其它金銀瓷器等的發展，更使銀器從西化中加入了三代的符號，並在瓷器發展中成為宋瓷別於其前的重要特質，使三代銅器意象在其它更時尚的質材中再生。把三代銅器從三代貴族所坐擁的家國重器及主要用在祖先崇拜中，放到儒釋道及民間信仰的新情境中再生，隨之質變，而與三代漸行漸遠。並進一步走入宋代庶民的現世生活中，從廟堂到陳列在明窗淨几之中，成為宋人坐擁三代的符號，也成為不同階層中，不同的「考古」及「玩古」的新價值觀的具體意象。只要其所附麗的儒、道、佛及民間信仰的力量還存在在社會中，擁有其基本的人群與信眾，它們在擴增的群眾基礎中逐漸沉澱下來，成為包括朝鮮等東亞一帶文化中揮之不去的意象，正是宋代所發展的從「考古」轉變到「玩古」觀念的結果。這種發展方向歷經元、明、清為期千年，在宋代已啟端倪，存在世界的各公私博物館收藏的宋以後銅器，以及考古出土的具有三代銅器意象的銅、瓷、銀器正見證了此事實。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1983-88。
-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文彥博，《潞公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00冊。
- 王應麟，《玉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944冊。
- 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宋伯仁，《梅花喜神譜》，《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4。
- 宋應星，《天工開物》，臺北：臺灣商務，1987。
-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325冊。
- 沈括，《夢溪筆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62冊。
- 周密，《癸辛雜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40冊。
- 契嵩，《鐔津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91冊。
- 寇準，《忠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24冊。
- 梅堯臣，《〈新息重修孔子廟記〉》，《宛陵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28冊。
-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陳元靚，《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8，至元六年，鄭氏積誠堂刻本。
- 陳元靚，《事林廣記》，影印元後至元六年鄭氏積誠堂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
-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4冊。
- 陳敬，《〈喜香〉》，《陳氏香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44冊。
- 楊仲良，《資治通鑑長編記事本末》，永和：文海出版社，1967。
- 鄒造，《道鄉集》，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162-163冊，卷37。
- 翟耆年，《〈李伯時考古圖五卷〉》，《籀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81冊。
- 趙希鹄，《〈仿古銅器〉、〈銅腥〉》，《洞天清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71冊。
- 趙明誠，《金石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52冊。
- 趙蕃，《淳熙稿》，影印文淵閣四庫本，1155冊。
-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80冊。
- 劉敞，《〈先秦古器記〉》，《公是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95冊。
- 歐陽修，《集古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81冊。
- 蔡襄，《端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90冊。
- 鄭樵，《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372冊。
- 聶崇義，《三禮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9冊。
- 蘇軾，《東坡集》，北京：線裝書局，2002。

二、近人論著

大邑縣文化館

〈四川大邑縣安仁鎮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7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等

《南宋官窯》，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6。

文化公報部、文化管理局編

《新安海底遺物》，漢城：同和出版社，1981。

方志良

〈浙江諸暨南宋董康嗣夫婦墓〉，《文物》，1988年11期。

毋學勇

〈劍閣宋代窖藏綜述〉，《四川文物》，1992年3期。

王子今

《中國盜墓史，一種社會現象的文化考察》，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

王世民

〈北宋時期的制禮作樂與古器研究〉，《揖古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王曾瑜

《宋朝階層結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冉萬里

〈唐代金屬香爐研究〉，《文博》，2000年2期。

出川朗哲、穆向前摘譯

〈遂寧窖藏出土龍泉窯青瓷與新安二中沉船及日本傳世品之比較〉，《宋瓷精華》。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范桂杰、胡昌鈺）

〈四川德陽縣發現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7期。

四川省博物館、廣元縣文管所

〈四川廣元石刻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2年6期。

石守謙、葛婉章編

《大汗的世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館編著，謝濤

《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朱漢民等

《中國學術史》，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宋元卷上。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等

- 〈江西鉛山縣蓮花山宋墓〉，《文物》，1984年11期。
- 江油縣文物保護管理所（黃石林）
- 〈四川江油縣發現宋代窖藏〉，《考古與文物》，1984年6期。
- 余和年、鄧章泉
- 〈大竹出土明代銅器〉，《四川文物》，1994年1期。
- 余英時
- 《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出版社，2003，上篇。
- 李弘祺
- 《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
- 李建軍
- 〈福建泰寧窖藏館器〉，《文物》，2000年7期。
- 李乾朗
- 《鄞山寺調查研究》，臺北：臺北縣政府、行政院文建會，1988。
- 李偉綱、何瀛中
- 《宋瓷精華——金魚村窖藏》，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1。
- 杜正賢
- 《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肖夢龍
- 〈試談宋代金銀器的造型和裝飾藝術〉，《文物》，1986年5期。
- 周心慧
- 《新編中國版畫史圖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第一冊。
- 定縣博物館
- 〈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 林士民
- 〈浙江寧波天封塔地宮發覺報告〉，《文物》，1991年6期。
- 河南文物研究所、鞏縣文物保管所
- 〈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88年3月。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
- 《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寶豐清涼寺汝窯址2000年發掘簡報〉，2001年11期。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 《北宋皇陵》，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9。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 《汝窯的新發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

邵伯溫

《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金中樞

〈北宋科舉制度研究〉，《新亞學報》，6卷1期，1964年。

〈北宋科舉制度研究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5期（1978年7月）。

金琦

〈南京市郊區龍潭宋墓〉，《考古》，1963年7期。

胡昭儀、劉復生、粟品孝

《宋代蜀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7。

重慶市博物館

〈重慶市榮昌縣宋代窖藏瓷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孫定榮

〈江西金溪宋孫大郎墓〉，《文物》，1990年9期。

容庚

《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社，1941，燕京學報專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浙江越窯寺龍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11期。

袁華

〈浙江德清出土南宋紀年墓文物〉，《南方文物》，1992年2期。

陝西法門寺考古隊

〈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10期。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窯博物館

《宋代耀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陝西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大學震旦古文明研究中心編著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宿白

《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1。

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常清市博物館（徐小林）

〈常清黃土山宋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學會合編，《湖南考古》，長沙：岳麓書社，2002下。

常清市博物館

〈常清黃土山宋墓〉，《湖南考古》，2002年下期。

張啓明

〈四川閬中縣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7期。

張臨生

〈〔文王方鼎〕與〔仲駒方簋〕〉，《故宮學術季刊》，1997年1期，頁1-44。

張臨生

〈李公麟與北宋器物學〉，《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

郭黎安

《宋史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陳芳妹

〈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0期（2001年3月）。

陳夢家

〈宋大晟編鐘考述〉，《文物》，1964年第2期。

陶晉生

《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專刊102，2001。

森田憲司

〈關於在日本的《事林廣記》諸本〉，《事林廣記》，附錄。

黃公度

〈題順濟廟〉，《知稼翁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39冊，卷上。

黃石林

〈江西發現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7年2月。

黃惠賢、陳鋒編

《中國俸祿制度史》，武漢：武漢大學，1996。

黃進興

〈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談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卷4期（1990年12月）。

黃頤壽

〈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年7期。

葉紅

〈浙江平陽縣宋墓〉，《考古》，1983年1期。

葉國良

《宋代金石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文學研究所，1982。

葛兆光

《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2001。

遂寧市博物館（莊文彬）

〈四川遂寧金魚村對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4期。

綿陽市博物館（胥澤蓉）

〈綿陽市出土宋代窖藏銀器、錢幣〉，《四川考古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趙一新

〈浙江磐安縣安文宋墓〉，《文物》，1987年7期。

齊東方

《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樊瑞平、郭玲娣

〈河北正定舍利塔基地宮清理簡報〉，《文物》，1999年4期。

蔣維鎡編校

《媽祖文獻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蔡玫芬

〈論「定州百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確性及十二世紀官方瓷器之諸問題〉，《故宮學術季刊》，15卷2期（1997年冬季）。

鄭振鐸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蕭高洪

《隋唐宋印風（附遼夏金）》，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薛堯

〈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年11期。

謝明良

〈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期（2004年9月）。

〈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臺北：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

謝濤

《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韓偉

《磨硯書稿——韓偉考古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韓森 (Valerie Hansen), 包委民譯

《變遷之神》(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羅家祥

〈「崇寧黨禁」與北宋晚期政局〉, 《北宋黨爭研究》, 臺北: 天津書局, 1993。

羅振玉

〈天竺靈籤跋〉,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蘇州博物館、江陰縣文化館

〈江陰北宋「瑞昌縣君」孫子娘子墓〉, 《文物》, 1982年12期。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等

《ひのセキモの李朝—朝鮮時代の陶磁》, 東京: 讀賣新聞, 2002。

片山まひ

〈再生産される威信財〉,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 千葉縣佐倉市: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2002。

出光美術館編集

《地下宮殿の遺寶——中國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 東京: 出光美術館, 1997。

吾妻重二

〈宋代の家廟と祖先祭祀〉, 小南一郎編, 《中國の禮制と禮學》, 京都: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 2001。

國史編纂委員會

《朝鮮王朝實錄》, 漢城: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 1955-1963。

龜井德明

〈隋唐・奈良期における香爐の研究〉, 《亞洲古陶瓷研究》, 亞洲古陶瓷學會, 2004, I。

Eveleigh, Michael

“Later Chinese Bronzes,” in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Asian Antiques Fair, Hong Kong*, 1984.

Hardie, Peter

“Six Later Chinese Bronze at Bristol,” *Appollo*, vol.XCII, 107,1971.

Harrist, Robert Jr.

“The artist as Antiquarian: Li Conglin’s study of Early Chinese Art,” *Artibus Asiae*, Vol. 55, no.3-4, 1995.

Haskell, Francis & Nicholas Penny

Taste and the Antique,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Hausmann, Ulrich

“ In Search of Later Bronzes,” *In Scholars Taste*, Sydney: Sydney L. Moss, ltd., 1983.

Kerr, Ross

“ The Evolution of bronze style in the Jin,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Oriental Art*, vol.XXVIII (2), 1982.

“ A Preliminary note on some Qing bronze types,” *Oriental Art*, vol.XXXI (4) , 1980/81.

“ Metalwork and song Design: a bronze vase inscribed in 1173” ,*Oriental Art*, vol.XXXII (2), 1986, Ross Kerr, *Later Chinese bronze*,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990.

Mowry, Robert D.

Chinese's Renaissance in Bronze, the Robert H. Clague Collection of Later Chinese Bronze 1100-1900, Phoenix: Phoenix Art Museum, 1993.

Poor, Robert

“ Notes on the Sung Dynasty *Archaeological Catalogues*,”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19, 1965.

Rawson, Jessica

“ Novelties in Artiquarian revival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bronze,” 《故宮學術季刊》，22卷1期，2004年秋季。

Watson, William

“On Some Categories of Archaism in Chinese Bronze,” *Arts Orientals*, 1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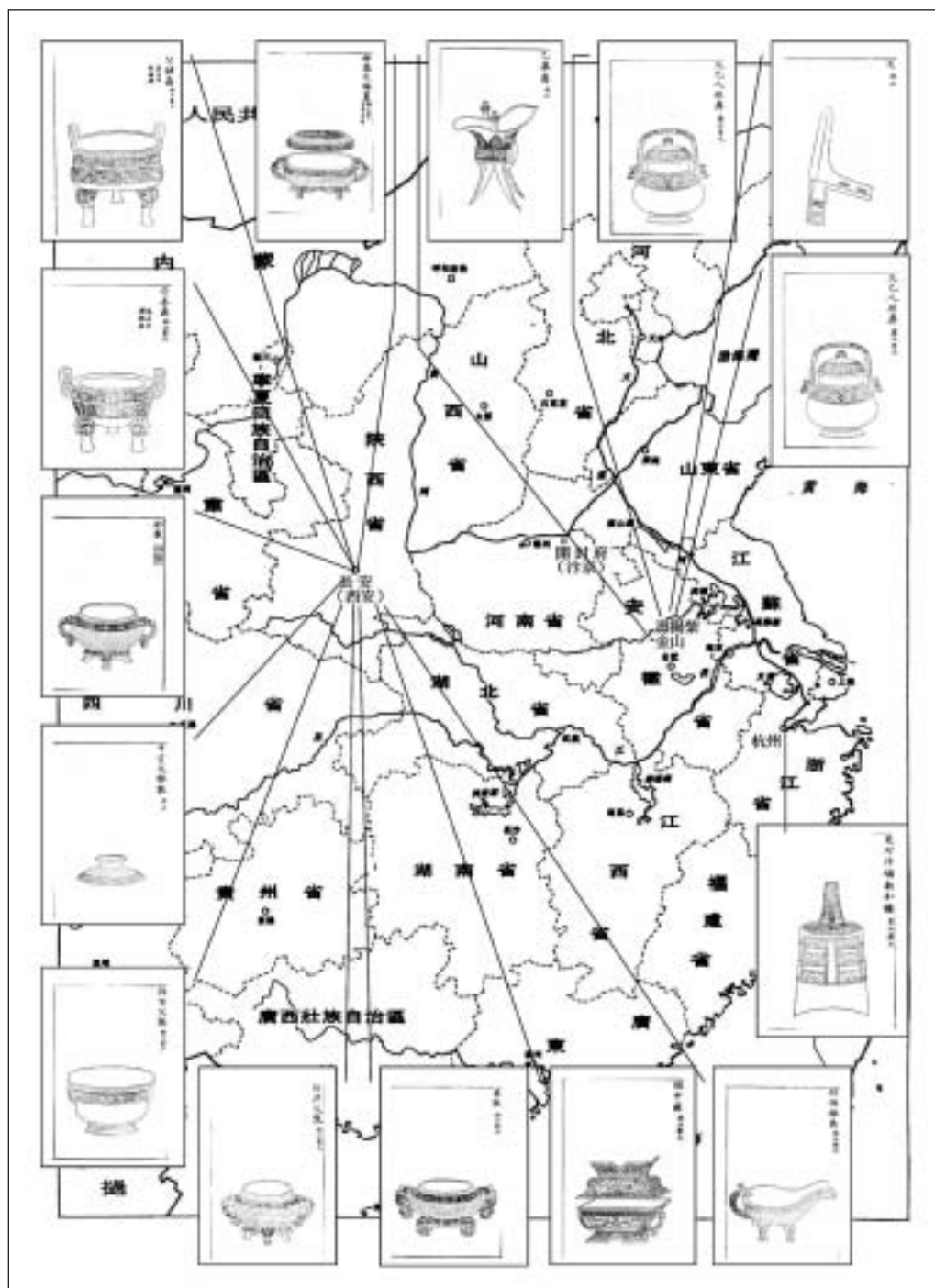


圖1 地圖



圖1-1 劉敞收藏，《考古圖》



圖1-1 劉敞收藏之二，《考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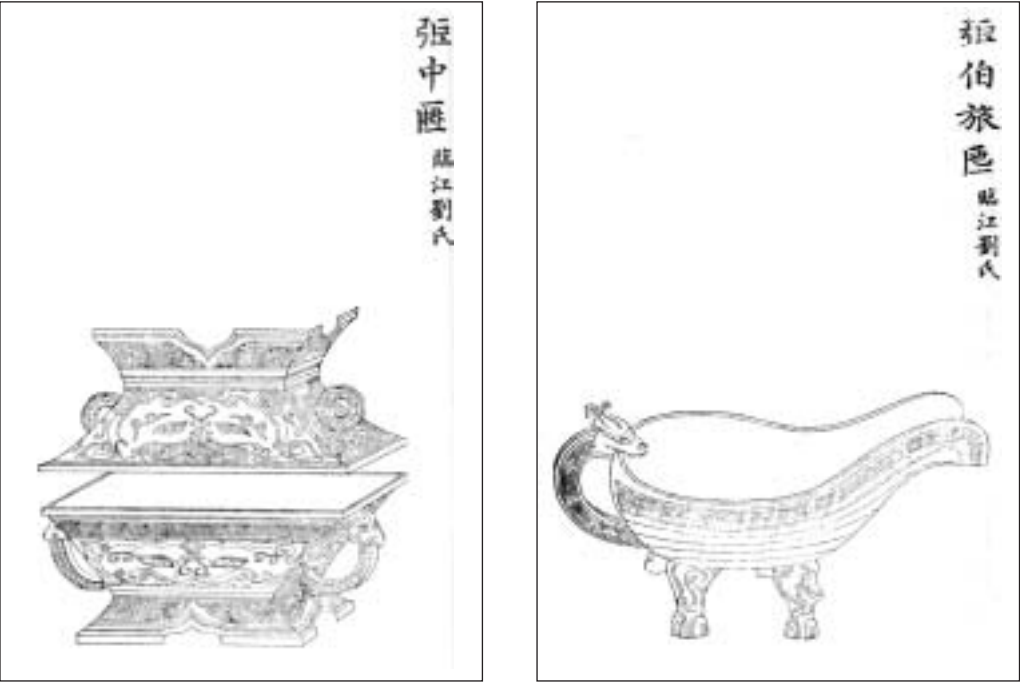


圖1-1 劉敞收藏之三，《考古圖》



圖1-2 李公麟收藏之一，《考古圖》



圖1-2 李公麟收藏之二，《考古圖》



圖1-2 李公麟收藏之三，《考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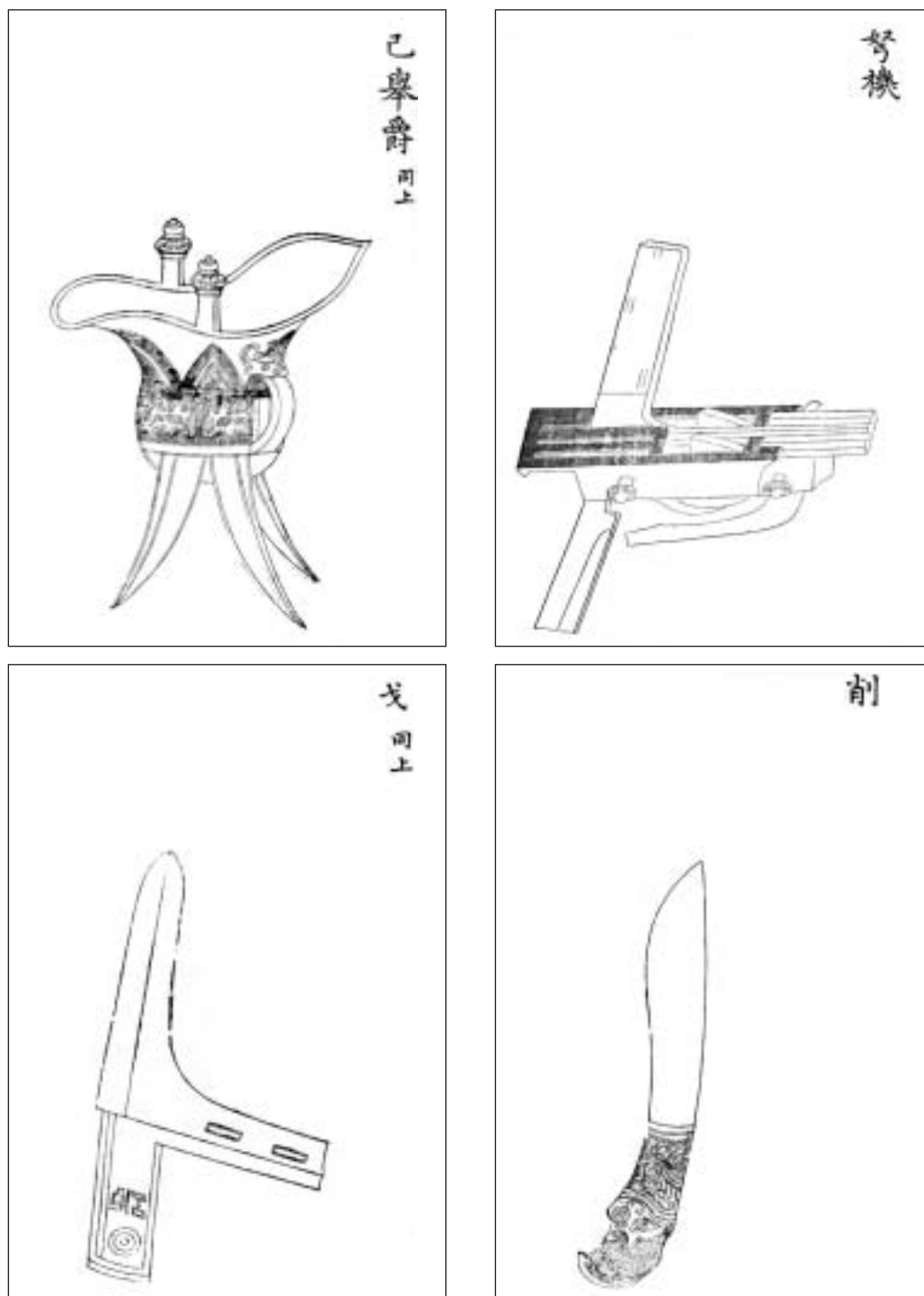


圖1-2 李公麟收藏之四，《考古圖》



圖1-2 李公麟收藏之五，《考古圖》



圖1-2 李公麟收藏之六，《考古圖》



圖1-2 李公麟收藏之七，《考古圖》

圖1-3 蘇軾收藏，《考古圖》



圖3-1 銅祭器 泳澤書院 元《《大汗的世紀》
，頁120，圖IV-3





圖3-3 簋（《李朝——朝鮮時代の 陶瓷》，頁7）



圖3-4 仿古銅器（《新安海底遺物》，頁123，圖版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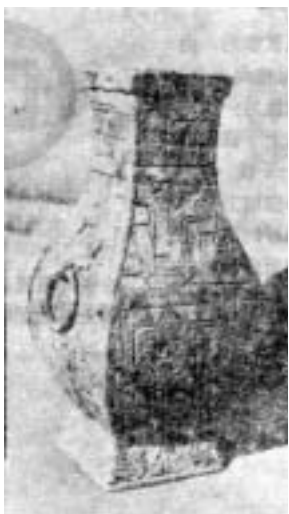


圖4 壺 浙江平陽
淳熙二年（1175）
黃石墓（《考古》，
1983年1期，頁80，
圖2）



圖5 政和鼎及銘文，政和元年1116（《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圖版I-24，頁100；頁302，插圖21、22。）



圖6 蕤賓鐘（《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圖版I-27，頁103。）



圖7 紹興豆及銘文（《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圖版I-25，頁101。）



圖8 觚，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圖版36，頁67。）



圖9 銀製鍍金香爐 河北定州五號塔基
高25.5公分（《地下宮殿の遺寶》，圖8）



圖9-1 白磁香爐（《地下宮殿の遺寶》，圖63）



圖9-2 鎏金臥龜連花紋朵帶五足銀燗爐
（《法門寺地宮珍寶》，圖14）



圖10 三彩陶爐 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
（《文物》，1999年4期，頁38，圖2）



圖11 耀州窯址出土的五足爐（上）與鼎式
爐（下） 陝西 耀州（《宋代耀州窯址》
圖版 85：2、5）



圖12 焚香圖 四川廣元（《文物》，1982年6期，圖）



圖13 天竺靈籤第十九（《中國古代版畫叢書》I，頁282。）



圖14 天竺靈籤第七十（《中國古代版畫叢書》I，頁295。）



圖15 銀香爐 浙江寧波天封塔
（《寧波文物集粹》，圖103）



圖16 枯槎顯聖（《媽祖》，頁24，圖1）



圖17 銅爐溯流（《媽祖》，頁25，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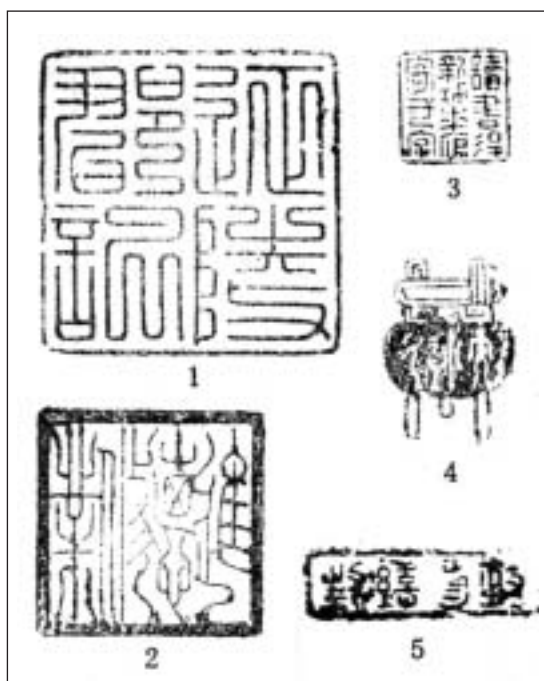


圖18 四川江油窖藏 印文（《考古與文物》，1984年6期，頁54）



圖19 桂軒印 《隋唐宋印風》，頁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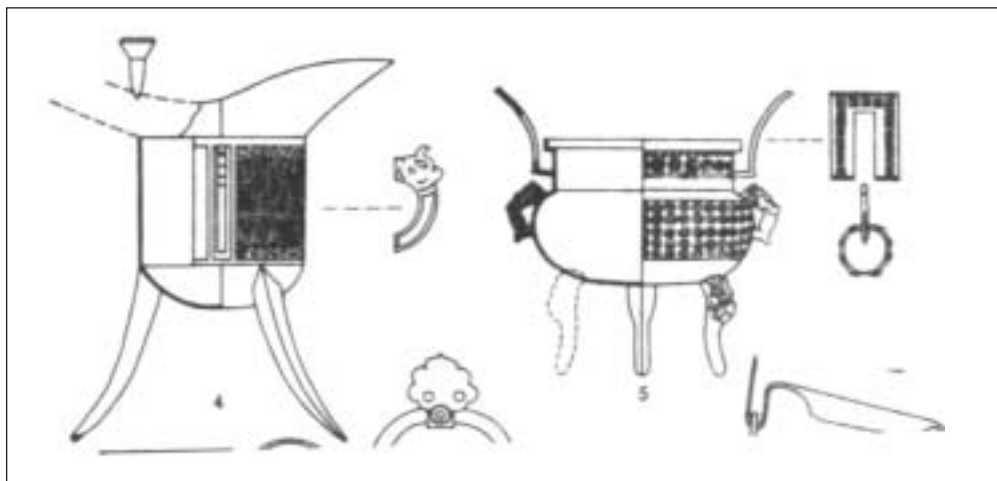


圖20 爵與鼎 四川江油窖藏 南宋（《考古與文物》，1984年6期，頁53，圖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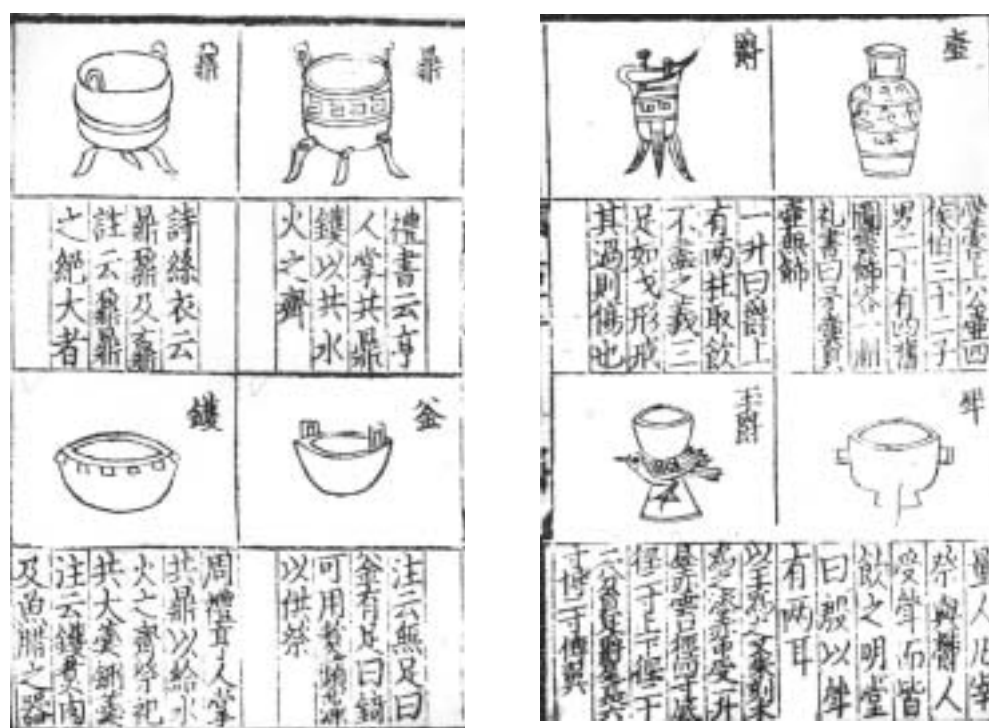


圖21 爵與鼎 《事林廣記》（建安椿莊書院刊本）



圖22 鼎 四川遂寧金魚村窖藏
 (《宋瓷精華—金魚村窖藏》，
 頁82，圖55，2210)



圖23 八卦紋鼎 四川遂寧金魚村窖藏
 (《宋瓷精華—金魚村窖藏》，頁40
 ，圖8)



圖24 八卦紋鼎 四川重慶榮昌窖藏
 (《四川考古報告集》，圖版4之6)



圖25 八卦紋鼎 新安海底沈船 元
 (《新安海底遺物》，頁49，圖52)



圖26 八卦紋鼎（後仿）淡水鄭山寺 實地拍攝



圖27 銀鼎 福建泰寧窖藏 南宋末元初
（《文物》，2000年7期，頁66，圖7）



圖28 銀執壺與溫碗 四川彭州 南宋
（《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
彩版39）



圖29 白沙宋墓壁畫 河南禹縣白沙（《白沙宋墓》，彩版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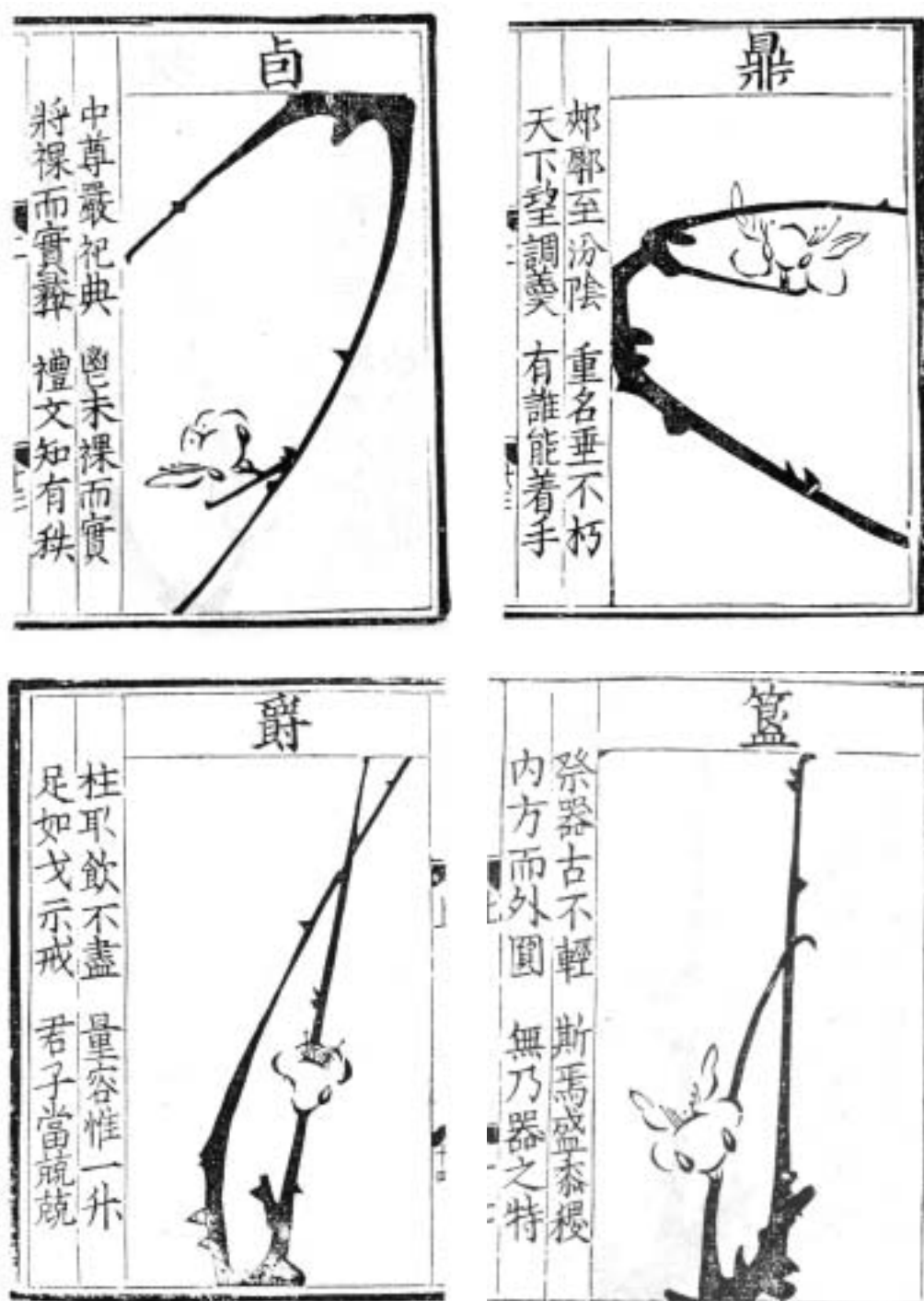


圖33 《梅花喜神譜》，卷上，頁59、71、54、51



圖34 《虞齋考工記解》



圖35 鼎與爵，《纂圖互注周禮》